

混雜與過渡

歐康諾〈凡興者必合〉中的城市空間

蔡秀枝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

摘要

本文將探討法蘭娜瑞·歐康諾(Flannery O'Connor)的短篇小說〈凡興者必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裡美國五〇年代的南方城市，如何成為轉載傳統社會與政治意識的空間，以及人們如何利用記憶來賦予城市空間新的轉機。歐康諾運用小說中主要的公車場景呈現出在時代轉換中，舊有社會的傳統白人優越意識如何殘存在人們的身份認同之中，以及生活在時代意識轉換下的人們如何面對黑白隔離政策解除後所帶來的黑白衝突與挑戰。〈凡興者必合〉中的空間場景是複雜的種族、性別、母子、歷史、新舊文化觀點的衝突空間。剛剛解除黑白乘客座位空間區隔的公車，對搭乘公車的乘客而言，是環境認知上內在與外在的衝突空間。經由對空間中各種言行、舉止、思維與想像的探討，可以發現歐康諾對此一複雜交錯的公共空間中各種權力關係與運作的認知，以及她對傳統南方蓄奴文化與種族歧視所導致的黑白身份與認同問題的關注。本文將援用並重探列斐弗爾(Henri Lefebvre)有關空間乃社會空間、社會空間的再／生產、以及認知體系運作的幾個議題，來探討小說文本中屬於五、六〇年代美國南方黑白市民間內在的認知差距與他們在公共空間中受環境影響而產生的行為，與這行為所可能帶來的對空間政治議題的重新認知與建構的可能性。

關鍵字：城市空間、美國南方、解除隔離、種族、性別、母子關係、法蘭娜瑞·歐康諾、〈凡興者必合〉、列斐弗爾。

Mixture and Transition

The Urban Space(s) in Flannery O'Connor's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Hsiu-chih Tsa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atial politics inscribed on human memories and practiced in the public social spaces in Flannery O'Connor's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The narrative event happened on a bus in a small American southern town in 1950s, while the public space was just desegregated. The riders on the bus were all facing a new situation and both the white and the black people were not used to this kind of spatial relationship. Their behavior and thoughts could be seen as the results of a much more complicated inscription of the Southern culture and history of slavery and discriminati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Southern culture make the fictional urban space full of mistrust and threats. Henri Lefebvre's concepts such as "space is social space"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pace will be re-examined and applied to analyze the various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gendered space(s)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struggles both on and off the bus in the

narrative as the products of particular social and cultural spaces. The possibility of "convergence" as rehabilitation in the public spac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ivate one become the problematic issues of spatial politics the characters should deal with personally at the end of the fiction.

Keywords: urban space, American south, desegregation, race, gender,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Flannery O'Connor,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Henri Lefebvre

1961年，美國南方正沸騰著黑白種族間的敵意與忿怒的年代，法蘭娜瑞·歐康諾(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完成了〈凡興者必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這篇短篇小說，在1961年十月的《新世界寫作》(*New World Writing*)上首次刊登，並在1963年得到歐·亨利(O. Henry)短篇小說獎第一名。歐康諾死後，費茲傑羅(Robert Fitzgerald)集結了歐康諾其他幾篇小說，出版了歐康諾的第二本小說集子(1965)，並且採用書中第一篇故事的標題作為書名。費茲傑羅將這個最後的集子以《凡興者必合》做為標題，希望點出這位年輕作家在生命的最後，¹仍費力思索、企圖藉由故事推展而有所闡示的幾個宗教上的議題。

歐康諾一直以作為一個天主教徒與南方作家自豪，〈凡興者必合〉這個故事的宗教意義即是來自天主教神學家德·夏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所宣揚，人與物最終都會在神之中聚合的論點。德·夏丹認為整個宇宙會永遠持續地做朝向聚合為單一體的進化前進，而這個單一體正是神。神號召著整個宇宙的聚合精神，而最終所有的人與物都會在神之中聚合。德·夏丹將這個最終的聚合點命名為「終點」(奧米茄點)(the Omega Point)，而神就是這個「終點」，因為神正是這個一切人、事、物的最終聚合處。歐康諾受到德·夏丹的神學神秘思維與對宇宙萬物生命行為的宗教性救贖與解釋的影響，也將這樣的看法融入她的小說中，讓她的人物能在最終時刻對世界有某種程度的體認，而這種體認當然是與朝向神做為最終聚合處的觀念是相關的。除了以宗

¹ 歐康諾與日益惡化的紅斑狼瘡(lupus erythematosus)奮鬥經年，因為病情惡化與接受化療之故而導致身體不良於行。在與日漸虛弱的身體競賽的日子裡，歐康諾依舊日日勉力支持著繼續她的寫作於不輟。

教面向解釋〈凡興者必合〉之外，²歷來批評家比較多著墨於探討故事中南方舊有禮儀(manners)文化之衰敗，以及舊傳統與新文化的衝突如何造成朱力安母子間的對立。³本文則希望由城市生活空間的記憶、規訓與教化的角度，來探討歐康諾這個故事的寫作年代與所參考的真實事件，討論歐康諾如何運用美國五、六〇年代南方在種族議題上的紛紛擾擾，使〈凡興者必合〉故事中的城市空間與巴士場景巧妙地結合了南方在新舊時代轉變、種族議題與思想更迭中所必然要面對的騷動、敵意與可能的流血衝突，以便於將南方城市生活空間中蘊含的種族、文化、性別箝制與衝突的情形，以朱力安母子公車行的敘事暴露出來，因而能在

² 〈凡興者必合〉這篇小說中陰暗的層面與天主教教義的隱射，主要是由費茲傑羅在編輯出版《凡興者必合》這本書時的章節介紹中提出，以宗教的方式來解讀歐康諾的小說。有關此類宗教性的詮釋，請參見 Richard Giannone's *Flannery O'Connor and the Mystery of Love*, Margaret Earley Whitt's *Understanding Flannery O'Connor*, John F. Desmond's *Risen Sons: Flannery O'Connor's Vision of History*, and Robert Fitzgerald's Introduction to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³ 南方禮儀與文化教化的問題原本即是歐康諾特別喜歡探討的主題，並且被她用來作為出版她的評論集 *Mystery and Mann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2)的標題。研究歐康諾的學者們對於她對南方文化描述的熱衷與其小說裡角色對禮儀舉止的注重的看法是一致的，而歐康諾小說中如何呈現此種南方禮儀文化與宗教、倫理、社會等其他議題的關係，則一直都是晚近學者們熱烈開拓探討的主題。有關〈凡興者必合〉這個故事背後的禮儀教化與南方傳統文化關係，請參見 Josephine Hendin, *The World of Flannery O'Connor*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70), Jill P. Baumgaertner, *Flannery O'Connor: A Proper Scaring* (Wheaton: Harold Shaw, 1988), Miles Orvell, *Flannery O'Connor: An Introduction*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1), Richard Giannone's *Flannery O'Connor and the Mystery of Love* (New York: Fordham UP, 1999) and *Flannery O'Connor, Hermit Novelist* (Urbana: U of Illinois P, 2000), Susan Strigley, *Flannery O'Connor's Sacramental Art* (Notre Dame: U of Notre Dame P, 2004), Henry T. Edmondson III, *Return to Good and Evil: Flannery O'Connor's Response to Hihilism* (Lanham: Lexington, 2005)。

敘事裡開拓多重混雜的歷史、記憶、種族、性別等政治、社會與心理空間中，也開闢出宗教救贖式的、充滿悲憫與天啓的「合」(convergence)的可能性。

〈凡興者必合〉的故事是以一對家道中落的白人母子搭乘公車為主軸，帶入了整個南方在新舊時代轉換間的種種衝突：在家庭裡寡母與獨子因性別與身份認同而產生的差異衝突、在歷史時代的更迭中日漸沒落的舊日白人地主後代對自身身份想像的認同與排拒、以及新興的黑人與沉溺於歷史過去的白人對種族身份意識間的認同衝突。故事中的主角朱力安是個剛從大學畢業一年的打字機推銷員，他的母親含辛茹苦的將他撫養長大。兩人住在破舊的社區，過著貧苦的生活。朱力安每星期有一天必須陪同母親去搭乘公車到 Y 城裡的減重班上課。在故事中的公車上，朱力安母子遇到了另外一對黑人母子，雙方碰巧都在同一站下車，朱力安的母親因為與黑人母親發生衝突而意外死亡。一如歐康諾慣常的寫作手法，她並未在故事的敘事裡展現任何對黑白兩方思想與行為態度的直接批判。歐康諾只是單純地將公車上的公共空間當作整個敘事事件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因為它既是法律所允許的黑白種族間界線混除的一個公共示範空間，也是南方中下階級的人們日常生活空間的一部分。公車的空間與公車上人們的思想、言語、身體等各方面的接觸都具有顯露生活當下裡，故事中人物角色所承受的社會經濟、生活壓力、以及人物背後所背負的歷史與社會意識的傳承。於是狹小的南方公車上的空間就成了演繹歷史與社會生態更迭的最佳場所，而最後白人母親喪生的城市街道，則暴露出歷史過往所製造的種族差異是如何在新舊時空的轉換與過渡之間，變成可能的種族誤會與認知衝突的引爆點與施

暴處。

〈凡興者必合〉公車上兩對黑白母子的接觸，不僅呈現了整個五、六〇年代南方城市裡的種族關係，也在故事的結尾中預示了衝突後的流血與歐康諾所堅信可能出現的宗教救贖式的諒解與融合。這個公車喋血故事的背後，其實還有另一個真實的黑白衝突與壓迫的故事。1955 年十二月，居住在阿拉巴馬州的黑人女仕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下工後搭乘的公車上，因為拒絕讓座給一位白人紳士，而遭公車司機送往警局羈押。當地社區的黑人對此憤慨不已，在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帶領下展開了漫長的公車罷乘，終於在 1956 年十一月得到最高法院判決公車上的種族隔離措施違反憲法。⁴ 雖然現實世界裡阿

⁴ 美國南方州鎮公共空間中的種族隔離政策一直是黑人抗議白人利用空間的區隔來塑造黑白不平等和白人用以壓迫並剝奪黑人權利的重要議題。1954 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公立學校中的隔離政策是違反憲法的，也促使以反對種族隔離、壓抑、歧視與爭取黑人權益的黑人民權運動真正展開。而為抗議交通工具上的黑白隔離與歧視而進行的，著名的阿拉巴馬州蒙戈馬利巴士罷乘事件(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Alabama)，則不但是黑人集體抗議的成功例子，也是黑人爭取民權的重要運動之一。1955 年十二月一日，羅莎·帕克斯女士(於百貨公司擔任女裁縫)在下班乘車回家的途中拒絕在一輛蒙戈馬利巴士上讓座位給一個白種男性，因而遭公車司機召來警察予以逮捕。次晚當地許多黑人社區領袖(年輕的牧師馬丁路德·金恩博士也是其中之一)便聚集籌畫，商討因應對策。金恩博士告訴眾人，他們唯一可以做的反擊就是抵制巴士公司。於是在十二月五日這天，當地黑人居民以拒絕搭乘巴士做為抗議抵制蒙戈馬利巴士公司的手段。這個罷乘行動不但很成功而且更持續了一年多，從 1955 年十二月五日開始，直到美國最高法院在 1956 年十一月十三日做出判決，認為巴士上的種族隔離措施違反憲法，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聯邦法院的強制命令要求阿拉巴馬州執行最高法院的裁定為止，一共三百八十一天。金恩博士與其他黑人領袖的黑人民權運動與非暴力社會改革也於是展開，最終並進而促成 1964 年的民權法案與 1965 年的選舉權法案的誕生。有關帕克斯女士的故事、蒙戈馬利罷乘事件與黑人民權運動的關係，請參見 Jo Ann Gibson Robinson,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and the Women Who*

拉巴馬州公車罷乘事件的結局是光榮的、是遲來的正義，然而〈凡興者必合〉這個短篇故事所開展的，卻是屬於另一面的，藉由黑白間的衝突而凸顯出南方中下階級白人社會的封閉性，以及對這些人物的封閉生活、思想與態度上的反思。社會歷史上的錯誤規範與個人舊日記憶與信念所面臨的時代衝突，是屬於心理與意識形態層次上的排斥與可能的觀念開展。舊時代的規範鬆脫了，但是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其實仍有待考驗。歐康諾〈凡興者必合〉的故事將這樣的時代衝突濃縮在朱利安母子的公車行裡，於是公車這個公共的空間，就成了城市裡黑白種族交雜空間的縮影，而下了公車之後的兩對黑白母子間的衝突關係，也更彰顯了城市裡黑白意識衝突下可能上演的悲劇。歐康諾的〈凡興者必合〉提醒著我們，這樣屬於歷史過去的錯誤其實可能正在每個被過去歷史烙印的小市民身上重演，因為他們都無法脫離日常生活的空間，也無法不受這個充滿歷史記憶的空間與這個空間的律法所影響。所以當朱利安的母親發現公車上都是白人乘客時，她的反應是直接的、慣性的：「這整輛公車都屬於我們自己人了」(O'Connor 410)。⁵ 朱利安母親如釋重負的一句話，清清楚楚地將黑與白、

Started It: The Memoir of Jo Ann Gibson Robinson, Ed. David J. Garrow (Knoxville: U of Tennessee P, 1987) 與 *The Children Coming On...A Retrospective of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Ed. Willy S. Leventhal (Montgomery: Black Belt, 1998)。羅莎·帕克斯女士(1913-2005)這位長期為爭取黑人民權運動而努力的先驅鬥士，在 2005 年十月二十四日以九十二歲高齡逝世，靈柩並暫厝華府國會山莊供民眾瞻仰。她是歷來獲得這種禮遇的第一位美國女性與第二位非裔人士。

⁵ 本文有關歐康諾〈凡興者必合〉故事的中文譯文為作者根據原文所譯，譯文的出處與引文後面所附的頁碼均來自“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Flannery O'Connor: The Complete Stor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405-421。以下文中出現的中文譯文，都將直接標

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界限給點明了。這樣的態度與話語除了明白的顯露出她對時代轉變的無知與不能接受，也更暴露了整個南方傳統觀念在種族、性別等方面的訓育與壓制的根深蒂固。而早先朱利安母子出門乘車時有關黑人爭取平權地位一事的爭執，也就更加意義深長：

「現在已經沒有奴隸了。」朱力安忿忿地說。

「當他們還是奴隸時，他們過得很好。」她說。……

「他們是應該往上爬，是啊，可是應該是在他們所在的、圍牆的另一邊往上爬才對。」

「不要再說了，」朱利安說道。

「我替一些人感到可憐，」她說「那些半白的混血們。他們很悲哀。」

「妳別再說了。」

「假如我們是半白的。我們的感情也一定是混雜的。」

「我現在的感情也是混雜的。」他忿怒不平地說。(408)

整個南方畜奴的歷史背景生產了它自己所需的意識形態，也同時將南方社會塑造成黑白差異與區隔的場所。朱利安母親偏差的黑白觀念就正是「空間的意識形態」(Lefebvre 210)教育下，不具反省力的接受者與奉行著。因此城市公車不只是中下階級人們生活中所必須仰賴的交通運輸工具、是認知與訓育的場合、也是新舊歷史、新舊規範之間種種差異的衝突空間。

示原英文引文在此書出處的頁碼。

列斐弗爾將空間認知為社會的空間，並且將空間的概念劃分為三個部份——「空間的演練」(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本文對於〈凡興者必合〉故事的分析，將援引列斐弗爾的這種空間區隔，同時也將對這樣的區隔做進一步的探討與修正。席爾德(Rob Shields)曾對於列斐弗爾的三個空間區隔提出質疑。在這一層面上，我認同席爾德的質疑，因為列斐弗爾並沒有清楚地交代出這三個空間區隔的辨證關係。⁶ 我認為列斐弗爾辯證上的缺漏讓這三個空間的區隔失去互動關聯，反而極易造成模糊的並置或錯置、甚至平面式的切割。我認為必須要再就列斐弗爾的說法，重新將這三個區隔之間相互的辨證關係與可能的推進、反省與演繹的方式加以闡釋與連結，才能顯現出多重的與多意的再／生產空間，而不是重蹈覆轍般的關係鏈結與空間再生產；至於多重再／生產空間的產生，則主要應與來自於因歷史距離而得見的重新認知與反省相連結。我的論點是，有關歷史距離所形成的重新認知的可能與反省(請見本文第三與第四部分的討論)，將不會在第一部份「空間的演練」(spatial practice)(本文第一部分的討論)中出現。因為根據列斐弗爾對空間三個區隔的描述來判斷，除非空間第一部份裡，經由歷史的傳承而得來的錯誤

⁶ 有關這三個部份的詳細說明，可參考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9。席爾德對於列斐弗爾這三個部分間的討論，大抵是依據列斐弗爾《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說法加以引申說明，但是席爾德最後依舊提出質疑，懷疑列斐弗爾為何在提出這三個空間區分時，沒有對這三個空間之間的可能辨證關係加以說明？席爾德認為這是導致這三個空間常被誤解與錯誤並置連結的原因。(172)

認知能夠被繼續更深入的檢討與悔改，否則這個部份的空間演練其實僅只是一種日常活動的呈現，並未具有任何可茲改進或促進反省之處。我認為唯有經由對第二部份「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中各式規定與制度對行為舉止與意識觀念等等的限制(請見本文第二部分)與對第三部份「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中個人與社會想像空間等論述(請見本文第三部分)做進一步的檢討、反省與確切體認，才有可能產生歷史的反省力，而也許經由這種歷史的反省力，人們才有可能進入歐康諾所描述的「合」的空間。

本文以下的討論即是將城市空間作為一環境認知和人際關係的演變場合，來探討歐康諾〈凡興者必合〉中所呈現的性別、母子、種族與社會歷史記憶差異所造成的空間認知差距，以及因之而產生的差異及歧視性人際關係(例如男女尊卑、母子關係、黑白種族間互動等)如何在既定的歷史社會空間中被再／生產出來，並且探討個人想像與公共空間實踐中實與虛的對應，空間中位置的所在與變動所寓含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意義，以及這些時空變動所可能產生及帶來的影響與社會意義。

一、社會空間中的歷史傳承

五〇年代的美國南方州鎮在當時因為經歷了種種黑人民權運動的洗禮而被迫改變以往各種剝奪黑人權利的規定，將各種公眾場合中區分有色人種與白人的空間分隔限制與種種區分黑白

空間的告示撤除。⁷ 實施多年的黑白隔離政策因為面臨黑人的抗議與黑人民權運動的挑戰，漸漸失去法律的支撐。去隔離政策雖然有法律的明文規定與保障，但是距離真正的黑白去隔離與黑白平權的理想仍然有相當的距離。故事發生時，朱力安的母親因為體重的關係接受了醫生的建議去城裡參加減重班。這原本並非大事，但是卻因為時空的關係使得進城一事變得複雜而危險。朱力安的母親希望朱力安能陪她去，而不是讓她獨自一人在晚上搭巴士進城。朱利安老大不願意這種安排。因為「他的母親在減重班裡，算是幾個比較苗條中的一個」(405)，似乎不太有必要上這種課程。其次，他的母親總是喜歡在公車上向人談論他是大學畢業生，以後會是個作家等等諸如此類的誇耀。再者，朱利安的母親之所以不願意單獨搭巴士前往的原因是因為巴士已經解除座位的黑白隔離了，黑人此後可以隨意選擇坐在他想坐的座位上。對朱力安而言，這沒有什麼值得為之驚異或擔憂受怕之處。但是對他的母親而言，公車裡由白人掌控與分配位置的空間已經風華不再，「它們已經混雜了」。做為一個有教養的淑女，她可不想在沒有男伴的陪同下在夜晚進城，尤其是要搭乘黑白混雜的公車更是一個大問題。解除隔離的空間讓朱力安的母親感到不安與痛

⁷ 美國南方各州在十九世紀八〇年代到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實行黑白種族隔離政策，並定有法律規定與懲罰，限制人們不得與不同種族的人們交往。各項法規中最常見的是禁止不同種族間的通婚，黑人與白人不能進入同一所學校就讀，以及要求公共機關和各行業的所有人要遵守規定，在公共或營業場所中確實隔離黑人與白人顧客。譬如：電梯、車站、候車室、飲水龍頭和廁所等等公眾設施都必須區分為白人(whites only)與黑人(blacks only)專用。交通運輸工具如巴士則必須將黑人與白人乘客的座位做區隔，而且在巴士擁擠的尖峰時刻黑人必須先由前門上車繳費再由後門上公車。黑人與白人也不能在餐館的同一個房間中用膳。

苦。這個獨佔的空間原本是白人因歷史的關係而繼續擁有的，如今也因為歷史時間的變革而必需做修正。只是朱利安的母親卻仍然繼續期待黑人應該謹守他們的本分不要踰越。

小說裡當朱利安母子搭上公車並在前排的座位上落坐後，朱利安的母親就開始努力地巡視起這部半滿的公車，並且對她的搜尋結果感到滿意：

「看來整部公車裡都是我們自己人。」朱利安的母親說道。朱利安縮起了身子。

「打個岔，」公車座位對面穿著紅白帆布拖鞋的女士說，「前幾天我搭的巴士就滿是他們[黑人]，黑鴉鴉地一整群像跳蚤一樣——整個前座和整輛車都是。」

「現在這個世界可真到處都是一團亂。」朱利安的母親說，「我不知道我們怎麼會把它弄成這個模樣。」(410)

對沉迷在過去南方黑白身份區隔嚴明的世界裡的朱利安母親而言，只有全部都是白人的公車空間才能讓她感到一種空間與身份上的自在與從容。而「公車前座擠滿了黑人」這種情形則是普遍地引起兩個白人女士的不安與厭惡，因為黑白身份的界限顯然已經由於黑人的入侵前排座位而被侵犯與顛覆。政治力的運作與政治的機制塑造了人們的思考與意識形態。而社會空間就是這些力量最好的施力所與訓練場。朱力安母親的言談正是社會歷史運作之下的產物。即使家道中落，朱利安母親依舊認同她過去所受的

教育——因為她是個淑女，所以即使家道中落，她進城參加減重班也一定要穿戴整齊(戴手套和帽子)，並且對所有低下的階級顯示出她優雅高尚的情操與待人接物。她所心繫的禮儀和待人處世的眼光正好代表著舊時代白人優勢下傳統的南方(有金錢與權力的)男性父權社會對女性所施以的養成教育，而她本人，則是這教育下的一個成功的產品，也是一個在性別與自我意識上處處壓抑女性自我的歷史社會的犧牲者。但是當時代轉換時，她的舊教育和舊想法卻不僅面臨被淘汰的命運，更造成她與兒子間嫌棄不斷的原因。歷史的過去將公車公共空間做區隔以突顯黑白間的差異，所以公車上個人在空間中所佔位置的重要性遠超過實質上人的本質。但是朱利安的母親卻將時代的變遷歸諸於世界的混亂，而世界之如此混亂則指向更直接的源頭，那個應該好好治理黑白區隔的「我們」——白種男人——南方的統治者。在這裡我們不只看見了南方種族政治的壓制，也見到了南方性別政治的壓制。

小說中的公車到了下一站，後座一個白種女人下車，一個體型龐大的黑人男子接著上車：

他穿著得體，還帶了個公事包。他環顧了一下四周，然後坐在穿紅白拖鞋的女人旁邊。他一坐下就馬上打開報紙，將他自己隱身其後。朱利安的母親立即用手肘頂了頂他的肋骨，輕聲說：「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我不要自己一個人搭公車了吧。」

穿紅白拖鞋的女人就在這個黑人落坐的同時也起身前往公車後排，坐在剛剛下車的女人所空出來的座

位上。朱利安的母親趕緊傾斜出身子給她回敬了讚許的一瞥。(412)

社會空間被平等看待的結果，就是個別位置的特殊政治與文化意義的喪失，以及白人優越與應享有「殊榮」與「禮遇」心態的過時。穿紅白帆布拖鞋的女士因為不願與黑人「共享」這份「殊榮」而逕自往後面的座位坐下。由於這個自設的空間排他觀念，這位白種女性讓平權了的公共空間又再度充滿黑白間歧異恆存的火藥味。黑白種族在公共空間中的社會關係被「位置」突顯與表象化。即使在空間區隔已被廢除之後，人們仍可藉助自動自發的行為在空間中選擇放棄已經保有的「特殊」位置來突顯他們心中的感受。相對於他的母親與這個穿紅白拖鞋的女人的做法與認知，朱力安則主動換座位坐到這個黑人身旁以表示他對黑人的同情。但是這樣的行為不僅激怒他的母親，也同時讓對座有著暴牙的白種女人感到驚訝，「彷彿是看到一種新種的怪物一般。」因為她無法想像竟然有人要主動尋求坐在黑人旁邊。而且還是發生在公車的前排座位上。然而充滿嘲諷的是，在故事的敘述裡我們不難發現朱利安的母親、穿著紅白帆布拖鞋的女士、以及那個有著暴牙的女士在教育程度和社會身份地位上也許都要比那位她們所鄙視的黑人乘客(穿著相當體面整齊，提著公事包)來的低微。

黑白隔離政策將公車上前排的座位劃歸白人。黑人必須意識到他們的身份是不同的、卑微的，所以他們必須避開這個代表優越、強勢、主人階級的空間位置。這個空間區隔的做法使得公車這個空間亦成為黑人認知並接受白人對其地位、身份、道德、文

化和尊嚴定位的教化場所。人文地理學家索雅(Edward W. Soja)同意列斐弗爾的空間生產與再生產論，認為社會生活其實乃是社會性地理建構與空間關係所建制，空間性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界定了社會生活(Soja 90)。格雷戈力(Derek Gregory)在談論階級與空間時，也認為「空間架構不只是階級衝突表現的競技場，而且在這個空間中——並且也部分經由這個空間——階級關係被建構出來」(Gregory 120)。白人的優越感塑造了這個黑白區隔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又再度成為製造這種意識形態與認知架構的空間。弗雷澤(E. Franklin Frazier)在研究南方的黑人與社會政治體制時，認為南方的種族歧視已經經由政治與法律的機制將南方社會轉變成一個階級體系。⁸ 公車裡空間與位置的區別在日常生活中加深了白人的優越性地位與權力，也迫使黑人「認知」白人對他們的界定，接受他們相對於白人的，次等的階級、身份、能力、道德、文化、和尊嚴。黑人在這樣的白人想像中所扮演的，不只是異己，而且是次等人。但是當歷史的原因理由都不存在時，這種公共空間的區隔與運用便因為是種族差異與歧視的再生產元件，而面臨被新政治考量取消的命運。

然而沉浸在舊文化意識形態教導下的朱力安母親、那位穿拖鞋的女士、以及有著暴牙的女士，卻未必能立即接受這改換面貌的公共空間，以及其背後意識形態的更動所代表的深刻文化與政

⁸ 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弗雷澤提出的看法是：「由種族偏見所導致的私下的或公開的種族歧視都是爲了要將黑人維持在一個卑下的社會地位並且防止黑人與白人競爭的結果……由南方法律與慣例支持的公開的種族歧視已經使某些研究者認爲南方種族關係就是個階級的系統(a caste system)。」(672-3)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治意涵。這三位女性代表著習慣於舊日公共空間分配的南方舊勢力，舊思維的奉行著，對她們而言，公車上空間區隔的正當性是不必加以解釋的。所以即使時空轉變，她們依舊藉此來想像與主導一個不變的白優黑劣的幻覺。

南方白人運用政治力在空間中砌了一道牆，塑造了種族與階級的優越意識，將黑白加以區隔。這就是爲什麼朱力安母親會相當自信地告訴朱力安，她的確不是看不起黑人，只是黑人可以往上爬，但是「應該在圍牆的另一邊往上爬」。城市的空間在此也已經被朱力安母親心中那道無形的「圍牆」分隔開了。白人在這邊，黑人在那邊；一如公車上的空間，只有白人能在這邊，黑人該去那邊。至於混血的人們，則是朱利安的母親最憐憫與悲哀的，因爲他們的身體與膚色是混雜的，他們的情感也是混雜的(408)。於是朱力安母親心中的那面牆就成了黑白的交界，成了派爾(Steve Pile)筆下人們在城市中以鄰里爲壑，互相輕視時，在心中(也希望能在此環境中)築起的那道阻隔彼此／此的牆：

牆是抵擋他者的胃甲——它是用來支撐『恐懼』和『厭惡』的情感：它是都市和身體的空間中一個堅硬的，高聳的，固定的，不可穿透的界線。這面牆不是真實的，但是它卻是非常的真實：它是一群人憤怒的焦點和記號。(Pile 6)

朱力安母親心中這面虛幻的牆不僅阻隔了黑白種族與文化間的接觸，也隔開並增強了黑白種族之間對彼此的恐懼與厭惡。而這種因爲文化意識形態作祟，繼而產生的對黑人與黑人身體的恐懼

與厭惡(尤其是他們竟然可以同樣地坐在公車的前座，與她們肌膚接觸)，正是朱力安母親不願獨自一人搭公車入城的原因之一，雖然這只不過是源於她所受教育中對於黑人異己的一種想像所製造出來的恐懼。朱力安母親的恐懼也是南方歷史中其他白種女士們所共有的、對黑人男性的身體的恐懼——對黑人男性身體所可能行使的暴力與對白人女性性侵害的恐懼。這樣的恐懼其來有自。由於種族、歷史、經濟與政治因素，南方白種男性將白種女性的貞潔加以神聖化，並當作是白種男人統治(甚至私刑)黑人奴隸的權力的一個重要的指標與象徵，所以他們不但誓死都必須保護白種女性不受那些黑人奴隸的騷擾與性侵害，並且也將這樣不受黑種人血統混雜的白種貞潔(*the white chastity*)做為指控黑奴染指白種女性與白種男性政治統馭的界線。所以白種女性的身體與貞潔也同時象徵著白人種族相對於黑人的崇高純潔與不可動搖的統治權力。⁹ 對朱力安母親來說，因為黑人是異己、是不同於白人、次於白人，所以他們的存在與他們的身體便向她(南方被保護的，也需要男性保護的淑女)昭示著危險與威脅。南方女性在黑白政治角力中，扮演著重要的象徵，她被南方白種男人尊重保護的身體，其實也是一個被烙印上性別的弱勢符號、一個被壓抑的身體。恐懼與厭惡使得習慣被保護(因為她們先被限制在某些空間之中)的女士們在日常生活之中隨時警戒著、提防著，以為只要「謹守界線」就能確使自己安全無虞，並且深信這樣的黑白區隔才是最正確的黑白相處之道。這矗立於人心中的、劃分黑白界線的牆是如此的高聳密閉，以至於不可能會在一夜之

⁹ 關於美國南方白人對黑人身體的污名化與政治化，請參見 Felipe Smith, *American Body Politics*,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98。

間就因為政治力的介入，而突然就在公車裡這幾個身處南方新時空的舊時代女性面前崩陷。

所以即使當黑人得到了正式的許可可以與白人對某些公共空間有平等使用權時，他們也未必能立即得到真正的平等與認同。於是公車內的公共空間就變成了另一個黑白種族間的角力場。雖然是黑白平等共用的空間，但是黑人在利用這個權利時，小說中三個傳統南方白人女性的反應卻是大不以為然。政治力可以要求人們立即遵守規定，但是人的意識形態與言行舉止卻未必能即時加以改正並遵行照辦。公車上的女士們與朱力安母親皆無法接受黑白間的平權空間，而其他的白人乘客則僅止於當做沉默的大眾，對整個公車中的座位變化以及黑白關係做無言或無動於衷的漠視／認同。至於終於能在前排就坐的黑人，小說中那位衣著整齊體面的黑人，在面對白人女士不屑與之同坐的身體語言時，所表現的，亦是沉默與「視而不見」。他一坐下，就立刻打開報紙，將整個人躲在報紙後面，似乎對剛才所發生的一切全然不知情一般。但是實際上這樣的舉止也明顯透露出他在享有平等的果實時，對擁有舊思維和偏狹種族／階級意識的白人的所作所為，是有著某種程度的認知、壓抑、甚至逃避。所以他選擇用「看報紙」／「隱身躲藏在報紙之後」的方式來避開與白人的敵意正面衝突，不願意再一次因為這樣的公共空間中身體的、言語的、或意識形態想像中的衝突，而引起更多更深的黑白糾紛與厭惡、憎恨。

然而即使朱力安在面對其母與其他女士們鄙視黑人的態度時內心的確對這樣的行為舉止深深感到恥辱與不屑，但是他本身所持的觀點也不盡能逃脫舊的意識形態。雖然他不排斥黑人，但

是他也只想利用黑人來激怒他的母親，與表達他無處發洩的憤怒與沮喪。朱力安幻想與有智識、有身份地位的黑人相識，甚至想利用與優秀黑人結交(而不是與智識程度低，工作職位或社會身份低的黑人交往)的方式來激怒他的母親，給她一個教訓，希望她知道世界早已不同於她記憶中的南方，黑人不但不是次等人，反而是高級人士，並以此好好痛擊他的母親，讓她鑽出她的幻想圈與自以為是，徹底明白她所處的新南方時空。

朱力安母親的錯誤是歷史所遺留的問題。她被過去的意識形態給圈圍，只認同於過去式中的想法與舊教育中所留有的對黑人的印象。她老天真地提醒朱力安他會成功，並且以為他之所以需要一點時間那是因為他剛畢業，而且外面的世界因為黑人興起的關係而變的混亂沒有秩序：「一切都需要花點時間，而且這個世界現在是一團混亂」(406)。她並不清楚其實即使花再多時間，朱力安都不一定會有什麼成就，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了(朱力安自己則相信他不會成功，也不會有什麼成就)，而且黑白人之間也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種族隔離的時空了。她認為外面的世界因為黑人興起的關係而變的混亂沒有秩序。但是這世界並不是如她所言的一團混亂，也不是如她所想的是因為黑白間的空間區隔或藩籬消失而變的混亂。正如朱力安想一再提醒她的，她並不知道她到底身在何處。因為問題並不是在於她的自我認同——她是否知道她是誰，她是什麼身份，而是在於她是否知道她現在所處的是完全不同的新時代。她認同的是一個消逝了的社會空間，所以她始終相信身份、地位、家世、出身就是一切：「只要你知道你是誰，你就無往不利」(407)。她絲毫不曾因為外界時空的改變而更改她的看法。「這個世界到處都亂七八糟。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把它搞成這個樣子」(410)。其實這真的是「我們」所製造出的問題：這是屬於「我們」這一群體的白種男性統治者所造成的問題。朱力安母親與對面座位女士的談話其實正透露了整個南方環境中，白人與黑人間某種緊張的關係。這種黑白差異的認知是透過她們所處的環境與教育來建立的。而她們兩人的對話則更加穩固了這樣的意念與意識。對社會環境空間的認知是一種印象，一種認知結構(Lynch 11)，而這樣經由環境來進行認知的結構在此處則是透過公車這個公共空間內的位置分配，以及這個空間中人們彼此的意見交換與共同觀念的再確立來進行強化的。因為相較於個人的認知行為，群體的認知行為是更具有影響力的：「認知是一種個人的過程，但是這些概念是社會的產物。我們與其他人溝通的同時，我們也學習著如何去觀看」(Pile 25)。在公車上朱力安的母親與對座的女士的談話正是這樣的一種對原先已經存在的意識形態與環境概念做更進一步的確認與強化。意識形態經由對人的召喚來使人成為一個主體(Althusser 47)，而過去的意識形態因為仍停留在這兩位女士的心中，向她們召喚，所以她們必須重訴／重塑過去的記憶與種族區隔的空間，才得以再次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自身的價值與安全感。

於是在重新被政治力詮釋的公車空間裡，懷著舊日南方白人優越感和種族歧視的女士們的觀看——對他者的觀看——卻始終停留在對異己(黑人不但是異於己，而且是次於己)的想像中。此時她們對單一黑人的觀看並不能超越她們原先所擁有的，因種族偏見與文化歧視而來的，將所有黑人做為一個種族(race)來看的印象。在這樣的印象中，黑人無法被當成獨立於群體之外的個人來看待，或是被當成是獨立的個人來認知與瞭解。而她們原先

對黑人的看法則因為這樣的彼此認同而更加穩固。黑白間的空間區分也因此在她們的心中更形正確。在此，將黑人做為一個種族來認知，並將南方白人對黑人種族的偏見與歧視進行合理化就變成一種知識的力量。公車上女士們的「溝通」正是她們「知識」的互通，而這種「溝通」則如奧爾森(Gunnar Olsson)所言，是「一種集體的暴力，設計來將異端置於社會凝聚力的祭壇上做犧牲，並以此將之中性化」(Olsson 86)的一種方式。在新的平權空間中，她們的觀看並未有新的見解或詮釋產生，而是經由彼此的言談與意見的交換溝通和感情的認同，再次確立舊有的思維與文化意識，因為她們的感覺與價值觀都在這件事上再度被彼此所贊同。於是歷史的傳承在公車上朱力安母親與白人女士們間的對話和她們的動作、姿態和反應中重現；這正是列斐弗爾空間分析的第一層次——「空間演練」——中上演的歷史重現，有如一種對過往經驗與文化意識傳承的召喚。這是一種歷史經驗與意識的再現與操演，但是卻缺乏再思考的能力與歷史距離所帶來的反省空間。

國家政治力的介入使城市空間變得複雜。政治力在空間中的運作因國家機器的介入而顯得強勢。在歐康諾的小說中，國家機器的政治力即是展現在取消黑人與白人間乘坐公車時的座位限制上。雖然公車上空間的平等共有可以被勉強維持，但是這樣地經由政治力所促成的平權空間其背後的意義與意識形態是否能真正地為黑白兩種種族所理解？再者，公車外的空間是否也依然有同樣的保障或同樣的政治力的約束？

二、性別與規訓的空間

人們的生活方式受到所處環境中規定與限制所規範，但是實際生活空間裡人們接受法規的限制規範與按章行事的程度是與權力機器運作的能力和執行的情形相關聯的。公車是半開放的空間，在其間的活動也因為這空間中公眾的互相制約，相互被觀看／監視，所以有其一定的規則必須遵守。因為在眾人的目光之下，不合宜的活動會遭受譴責——不論是公開或僅是公眾私下的議論。這種公眾互相觀看與監督的力量使得公車的公共空間有一基本秩序(社會的規章與範例)可被維持。這是為何朱力安的母親與穿紅白相間拖鞋的女士雖不接受新的政治思維，但是卻也必須遵守公車上的空間規定。相對於公車的半開放性和密閉性，街道則完全有屬於它自己的模式與規則。公車內因為人們的互相觀看而使得各種活動受到約制，但是街道卻無可避免地會因為其空間的開放性與出現人員及人員間關係的複雜性與多變而顯得無法可管。街道的開放空間使政府的威權因不易執行而變的充滿不確定性。

小說中朱利安母親參加的減重班就位在 Y 城黑人社區中，因此夜晚的街道不可避免地將造成她對獨自進城的憂慮。因為公共的空間，如公車和街道，使身體的碰觸——和不同身體間的接觸——變得可能而且複雜。人們對陌生人的疑慮，對與陌生人身體接觸的恐懼，尤其是對不同種族間身體碰觸的恐懼與厭惡，並不是城市空間的特有產物，但是城市因為有更多可能聚集不同種族共同生活而使這樣的隱憂更形惡化。人們對不同種族的偏見與歧視使人們總是將這樣的他者聯想成「不清潔的或具污染力的」

(Sibley 107)，而這樣的偏見與聯想一旦演變成普通的常識，就更使不同種族間的接觸變得可怕。小說中公車座位區隔的取消對朱力安母親和另外兩位白種女人而言，無異是允許公共空間中黑白混雜以及身體接觸變成可能。在公車上與黑人混坐在一起，即使只是空間位置上的混雜，對她們來說都是對她們的侵犯。空間的侵犯在此是被視同為是對自身的侵犯——對身份、地位、尊嚴的侵犯。所以穿紅白拖鞋的女士對黑人坐在她身旁的反應所採取的動作就是立即起身離開她的座位，以避免與黑人有任何空間上的混雜或身體的接觸，也同時表明她對黑人的看法與態度。黑白間的問題在城市公共空間中變得表面化而突兀。「在街道上和公共商場中，因為不同階層和性別的混雜而形成的對社會秩序的威脅是導致中間和上層階層的憂慮的原因」(Rendell, *Displaying Sexuality* 88)，而這種開放空間中的混雜不但使他們感到「公共領域被污染」，而且更讓人們對不同人種之間的碰觸到厭惡。開放的公共空間使不同的身體接觸變的可能而尋常，也讓平日自覺優越的白人感受到黑白交雜所帶來的恐懼，以及可能的身體接觸所帶來的尊嚴的冒犯與威脅。所以在歷史的過去，公車空間內強制將黑人與白人加以區隔，一方面是向黑人強調白人的優越與地位崇高，另一方面則保障了白人的身體，使他們免於受到與黑人身體接觸的威脅。但是街道的開放空間則不然。開放街道通常都缺乏法律秩序的監視，這是城市街道的隱憂。「有太多人在街上工作，但是公眾的法規卻普遍遭到漠視且不被尊重」，所以街道的控管是「非常有選擇性的」(Bromley 97)。因此開放的城市街道直接對人們(尤其是女性和女性的身體)造成威脅。這樣的恐懼是來自於街道這個完全開放的公共空間使各種冒犯的觀看，隱

匿的窺視，身體的接觸，伺機而動的侵犯，以及游走於法律邊緣的力量都得以展現之故。

女性對公共空間的恐懼與不安是伴隨著無可預知的他者(男性)觀看(male gaze)與陌生的他者對身體的可能接觸和傷害而來。行動力被限制其實是女性共同的經驗(Rose 29-40)，而夜晚在街道上行走更使大部分女性都聞之卻步：

我們不能自由地在這世上行走。如果我們真的如此做，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可能會因此付出我們的身體作為代價。威脅就在此。他們不問你你在街上做什麼，他們強暴你和肢解你的身體來讓你知道你該在哪裡。你在公共空間裡沒有合法的地方。(Parmar 113)

同時，南方種族歧視的文化更使街道這個開放空間充滿著未知的危險與可怕的隱憂。南方白種男性對白種女性貞潔的護守，使之不致遭受黑種男性的騷擾與侵害的觀念，是南方白種男性凌駕黑人的種族與政、經能力的象徵，而且白種女性崇高貞潔的神話不僅是南方白種男性用以合法化其統治(與私刑)黑人的方式，也同時造成對白種女性行動力的限制，並且也形塑她們對於黑人的偏頗觀點。擔心黑夜中潛存的黑人，以及她們可能因此受到侵害的想法，使得白種女性在夜晚充滿黑人的城市中更感覺倍受威脅。而朱力安母親對城市街道的恐懼也可以由此點來理解。黑人做為那個假設存在的觀看者/侵犯者是足以讓受南方淑女教育成長的年老白種女性感到不安。女人在都市中活動原本即受到許多限

制，¹⁰ 尤其是在南方的空間中，女人的活動是被保護，也是被限制的。南方黑人被形容成暴力的可能來源，因此南方白種女性的都市活動空間就因之減縮。她們在都市空間中與陌生男人，尤其是與陌生黑人男性間的互動就更顯可怕與充滿威脅。南方白種女性因此在都市活動與生活上被剝奪了其自主性。她們必須警醒地提防著身旁的陌生(黑)人，而這樣地意識使朱力安母親害怕獨自一人在晚上出門，她必須要有人陪她去參加城裡的減重班，否則她就必須要縮減限制她自己的社會生活範疇。

白晝的都市空間在文化意識和想像上早已是男人的空間(女人的禁地)，到了夜晚就更變成了罪惡的場所，對南方年老的白種女性形成莫大的心理威脅。由於怕受到攻擊或侵犯，南方女性被時刻提醒著黑白種族之間的不同，以及這不同所可能帶來的危險。這危險是莫名的，無以得知的，也因此無法提防。既然危險是不可預知，女性的下意識就必須承擔更多的驚恐，也因此必須更加依賴男性的保護／限制。在朱力安母親的想像中，都市公共空間中已經因為黑人的聚居而將充滿樂趣的免費城市減重班以及城市空間變成是一種威脅，它代表著黑暗不可預期的力量，這

¹⁰ Griselda Pollock 認為空間的性別化將女性特質與道德串聯，加諸於女性的行為之上。於是空間的禁制與不可逾越就轉化為道德的界線，迫使女性無法合法地自由進出公共空間。「對中產階級婦女而言，上街與不同社會成員組成的群眾混在一起不僅只是駭人而已，原因不僅是因為這是不熟悉的，而且是因為這在道德上是危險的。人們將一個 [女性] 是否能讓人尊重，與她的女性特質緊密地連結在一起，那就是不要在公開場合中暴露自己。公共空間法定上是男性的，並且也是屬於男性的空間；對女性而言，進入了這樣的空間就是進入了未可預知的危機之中。」(163) (“Modernity and the Spaces of Femininity.” *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Ed. Jane Rendell, Barbara Penner, and Iain Borde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54-67.)

個空間是不屬於白人的(這是屬於黑人的「那一邊」，四周滿佈著黑人的公寓和可能出現的陌生黑人)，不屬於女性的，尤其在黑夜這樣的空間就更不屬於年老的白種女性。然而朱力安對陪伴母親進城這種保護「淑女」的任務感到不耐，而對於母親表示出的莫名憂慮則是以母親侷限於南方種族隔離想法而極盡嘲笑。吉安諾(Richard Giannone)認為朱力安之所以不願意陪伴母親同行，乃出自於他拒絕讓母親利用辛苦犧牲她自己的養育方式來形成他的心理負擔(*Mystery of Love* 160-66)，布朗寧(Preston M. Browning Jr.)則以為朱力安是希望藉此展現他的獨立(101-08)，惠特(Margaret Earley Whitt)與艾德蒙生(Henry T. Edmondson III)則認為這是朱力安做為驕傲的新知識份子對服膺舊傳統的母親的抗拒(Whitt 115-21; Edmondson 118-19)。我以為這裡其實還有著朱力安做為傳統南方白種男性與知識份子的優越感，以及對強勢母親的反動。減重班所在的城市中心，由於聚居了眾多黑人而對朱力安的母親形成心中莫名的威脅。她所受的教育與意識形態使她對黑人的想法侷限在過去的歷史之中而無法跳脫，而要求朱力安護送。但是朱力安對她的懼怕就無法全然理解。黑人對年輕白人男性主角朱力安而言並未造成身體或思想上的威脅。所以他甚至思索著要假扮陌生人不理會他母親，給她一個教訓，讓她獨自下車去減重班，讓她知道她內心的恐懼是莫須有的：「他們下車的街角經常都空無一人，但是這街頭的燈光是夠亮了，而且讓她獨自一個人走過四條街道去減重班對她來說也應該是無傷的」(413)。在此朱力安以年輕男性的身份來質疑他的母親對黑人聚居的城市街道的驚恐是多餘的。

小說中朱力安的父親早逝，所以在某方面而言，南方男性對

女性的傳統照顧與活動範圍的限制及保護，對朱力安這個受新式教育洗禮的大學生而言，可能是一個不必要而且過去式的行徑。這個年輕的男性並未能想像夜晚的都市街道對他母親所造成的心理威脅。他只當他母親要他護送的要求是她受限於過去南方淑女教育的影響，所以上街進城都必須要打扮整齊(還要帶上帽子、手套才算齊備)，並且要有男性護送。再者，他也認為他最大的功用是在於她可以在公車上或減重班裡拿他的學歷來炫耀一番，一如她新買的那頂看起來極其可怕低俗的帽子、或是她的日本扇子、她的手套，他們都是她的尊嚴與驕傲的象徵。¹¹ 我認為另外還有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朱力安一向受到母親的保護，從來沒有想到過母親可能是脆弱的，也是需要被保護的。從來他的母親只有扮演強勢的行動者、家庭事務的主宰者與經濟的分配者。所以當她一再思索她是否該把帽子退回店裡去時——因為這七塊半可以用來付瓦斯費——朱力安很憤怒地說不用了，雖然他真的非常討厭那頂帽子，可是他不希望她的猶豫又再次提醒他，她是如何努力拮据的過日子以支持整個家庭及扶養他成人。她供他讀書，扶養他長大成人，大學畢業，現在還要替他解釋他的失意，為他盤算他的將來。也因此他早已習慣不用費心去扮演母親的保護者、家庭收入的負擔者、自己未來的掌握者。他可以躲在自己的天地中想像自己的傑出，嘲笑母親的不符時代潮流。但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他引以為憾的，一直無法脫離她強力陰影的母親，其實也有著因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而伴隨來的衝突

¹¹ 朱力安害怕並抗拒變成母親舊日驕傲的象徵這一點，幾乎是所有的歐康諾學者都認同的。請參見 Whitt, Giannone, Edmondson, Browning, Hendin, Orvell, Baumgaertner, Srigley。

與畏懼心理。他遺憾自己無法成為真正的男性，脫離母親的掌控。

我認為朱力安依舊受到南方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觀念的影響，所以生活在母親的羽翼下，而自己雖想獨立卻又苦無方法，這樣的情形的確令他難堪。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母親其實並非如他所想的，只是一個守舊的種族主義服膺者。做為女性，他的母親一方面要成為家庭責任的負擔者，又要遵守南方淑女養成教育下一個女性必須注意的規矩，並且還必須要教養她的孩子成為符合這樣的意識形態中的男性，這之間除了充滿艱辛之外，應該是有更多意識形態、思想與現實上的衝突的。做為女性，她必須是柔弱的，但是做為母親她又必須是堅強的。做為女性，她必須順從男性，但是做為寡母，她的所作所為對她的兒子而言卻又是太過權威。她希望她的兒子成器，她以為只要上大學，只要他有足夠的時間和磨練，他就能成功，但是他所受的教育卻讓他明瞭他很難在所處的環境中脫穎而出。所以我以為，除了母子間的權力關係之外，南方社會裡男性為中心的父權觀念與整個時代空間的變換應該是這對母子衝突的最大來源：

南方女性被一個社會的雙重限制所困住：她必須對男人順從、要溫文、要和婉；在她對待孩子們和奴隸以及操持家務時，她就必須表現出自信、進取，而且精力充沛。但是她始終都是一個模糊的角色，始終都在那裡而且被需要，但是卻很少以全然的姿態出現。她是「家裡的皇后」。(King 35)

這個「家裡的皇后」所能掌控的範圍與能力表現正是整個南方淑

女教育所規範出的神聖領域。它明顯地界定出女性的生活空間。將她們限制在家庭裡，將她們的能力與精明幹練鎖定在家務的操持上，然後家之外的世界，就順理成章的成了男性的世界。原本自信聰慧的婦女，一旦脫離她家庭的領地，就成了必須被保護的弱女子。她被教導要認清楚這之間的差異：女性不應涉足男性的天地與世界，這個世界是充滿威脅與危險的。在這個家之外的空間中，她是被觀看的對象，甚至是被侵犯、被傷害的對象，而且她對這樣的事情是無力抗拒的。

在南方，這樣的空間觀念——家庭是屬於女性的天地，家庭之外的公共場合則是男性活躍的空間——是與南方社會對女性的詮釋相契合的。也因此南方社會對女性的崇拜、神聖化與尊敬，和對她們的限制與照管便合而為一。南方的女性時常被比喻為土地、被喻為神聖的女神。她們必須要被保護，不受外力威脅與傷害，一如南方的土地必須被完整的固守一般(Westling 1-35)。女性被神聖化與被物質化、商品化的最終目的在此其實是同一的，那就是成為男性的財產。白種女性的貞潔正如「他」所擁有的政治權與統馭黑奴的權力一般，都是「他」必須要努力保護與固守的，以防止其他人(尤其是黑種男性)的冒犯、侵入或奪取。但是隨著對女性的神聖化而附加的保護與照料卻不是所有的南方女性都能「享有」的待遇。¹² 事實上只有少數的南方女

¹² 在探討南方淑女的傳統教育理念時，Westling 指出這種傳統理想本質上是虛構與神話的組合：「在本世紀初期，某些觀察家就認為南方淑女的意象除了對那些享有特權的人——當然是白人——之外，是不適當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南方大多數的婦女並不是這群幸運的人中的一員；就南方文化的神話來考慮，這大多數的婦女是不存在的」(16)。(Sacred Groves and Ravaged Gardens: The Fiction of Eudora Welty, Carson McCullers, and Flannery O'Connor.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85.)

性擁有這優越地位所帶來的尊敬、照顧與限制。但是這樣稀有的保護與限制卻相當反諷地成為南方淑女另一種值得驕傲之處。朱力安母親早年因為家境之故，得以受到此種南方淑女的教育和教化。她被南方父權／男性白人文化教導成一個淑女，一個遵守南方教條的典型女人。這樣父權／男性主義觀點使南方女性被教育成遵守規矩、有教養、受眾人尊敬的角色，但是也同時迫使她們必須接受父權／男性觀點的宰制。她們沒有自己的看法，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甚至她們的尊嚴也必須由別人(父權／男性觀點)來界定與維護。當她們接受了這樣的教化之後，她們也失去了自由的思想與自我的想像空間。所以我認為朱力安母親是南方淑女教育教導下的成果與犧牲品，所以當南方時空轉變之際，她既然早已被教導的完全沒有反抗或反省力量，也就只能沿襲過去歷史上這樣的男性觀點下做為淑女所應保持的一切禮儀與規矩，以及南方人對黑人的看法與態度。我認為此處正是歐康諾這篇故事，經由朱力安母親的角色刻畫，對南方禮儀規範教育與男性／父權文化所做出的最大的、側面的嘲諷與攻擊。

朱力安母親逃避現實空間的最佳良方就是將自尊自重與身份地位停留在過去她做為大小姐時被黑人女僕照顧的時空印象裡。她認為她的女僕是永遠會保護她照顧她的，然而她的女僕依舊是黑人，依舊不能僭越主僕的規矩。所以她才會直言不諱地說「我還記得那個老黑人，我的保母卡洛琳，世上沒有比她更好的人了。我對我的有色朋友們很敬重，我可以替他們做任何事……」(409)。但是最後她的結論卻仍是「黑人是應當站起來，但是應該在他們自己那一邊。」朱力安母親之所以有如此的結論是因為那是她的文化與社會所灌輸給她的意識形態——對黑人種族的

一種偏見／歧視：

因為種族偏見是「一種帶著情感偏見的態度」，所以一個人對他的偏見所提出的理由都是經過「合理化的說明」，而不是對他的態度提出「有理性根據的解釋」。在他為他的態度提供理由時，他是嘗試在讓整件事看起來合於邏輯或是正當的。例如，白人通常會將他們對黑人的偏見正當化，理由是因為黑人是懶惰的，缺乏智力的，或者不道德的……具有這樣種族偏見的人通常都致力於將這一種族的群體侷限在一種臣服低下的社會地位中。(Frazier 666-7)

所以朱力安母親認為他們(黑人，當做一個群體而言)不該企圖想在白人這邊獲得一席之地，因為黑白之間是有界線的，白人這邊是不該混雜著黑人的。她在白人與黑人間築起一道牆：區分開黑／白、權力、地位、尊榮，也隔開恐懼、害怕、威脅和陌生的文化。雖然是座無形的藩籬，這道牆的存在卻是根深蒂固。她所受的教育與她的養成環境使她完全接受這藩籬存在的必然性。

將白人的文化優勢轉換為必然與將南方女性的意象塑造為神聖不可攀，均是由南方受教育的、有權勢的白種男人所主導而成的文化意識與南方神話：

他們[受過教育和擁有財產的白種男人]握有直接的政治和經濟的大權。所有對南方女性特質的尊重的宣稱，以及最初對這些女性特質的虛構塑造，也都是來

自於他們。在這些自認為建立了騎士和文化的社會的男人眼中，女人是崇拜的對象、是謬司、是引領的聖者。(Westling 16)

這種被神話了的、關於女性的看法卻深深地影響著南方的社會，牽制著南方許多白人男女的意識。一旦這個特權(政治上和經濟上)開始萎縮，南方淑女想要維持她們的既有驕傲與特權，以及她們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種種保護，就不能再完全仰賴社會既定的，由父權／男性特權所維持的秩序和制度。她們可以選擇拋棄舊有的意識而獨立，亦或，她們必須再度仰賴她們週遭的人們，尤其是男人(父權／男性)的保護。這也是朱力安母親所面臨到的問題。舊有的社會秩序已不存在，黑白人種間的藩籬已打破，她沒有了舊有的保護傘，所以她必須堅持要朱力安，她的兒子(取代逝去的父親／父權)，來保護她，繼續支持她的南方淑女風範。可惜朱力安並不領情。

惠特、吉安諾、艾德蒙生與布朗寧等學者都認為朱力安母子間的衝突是新、舊南方文化的衝突。但是我要特別指出的是，朱力安不僅只是如學者們所言的，一個南方新文化代表，他還代表著一個失去傳統父權／男性特權光環、軟弱、但憤世嫉俗的半瓶子知識份子。歐康諾清楚明白地將朱力安描繪成這樣一個優柔自慚又有志難伸的青年：他不是南方白人(男性)特權的擁有者，他沒有政治或經濟上的大權，而且他也無法取代逝去的父親／父權。由於他的家庭背景與所受的教育，他也沒有繼承南方社會父系權威的意識，這也是他老是不能全然理解他的母親為何始終不能放棄過時的南方傳統觀念的地方。他的母親犧牲奉獻上她的一

生來栽培他長大，他始終被這樣的恩情壓迫地抬不起頭來：「她認為她成功了是因為她將他成功地撫養長大，並且供給他上大學，而且他長得這樣好——容貌端正(她沒有去填補她的牙齒為的是能讓他的牙齒長得強硬)，聰明(他知道他太聰明了以至於無法成為一個成功的人)，有前途(他的面前當然並沒有任何前途等待著他)。」「她的一生全都是掙扎著要在沒有雀斯特尼家族的財產下，努力地做個像個雀斯特尼家族的人，並且供給他任何她認為一個雀斯特尼家族的人應該擁有的東西。」(411)。她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根據想像中的律法生活：這律法正是她必須為他犧牲她自己，以培育一個南方男性／父權觀點下合於正統的男性。但是在神聖、崇高、驕傲的南方淑女意象的背後，歷史的真相是大不相同的。一個寡婦要孤單地扶養小孩長大是完全不同於一個養尊處優的淑女，在眾多黑人奴僕的幫助與丈夫的支持下，照顧她的家庭和小孩的情形：

南方的法律傳統使十九世紀的女性很難掌控她們的財產，想自己管理事務的寡婦們會被看成是傲慢自負的人。南北戰爭的屠殺製造了許多必須獨立在可怕的重建回歸合眾國時期，扶養支持她們家庭的寡婦。雖然大部分的人是成功了，但是她們必須『敏銳地掙扎抗拒那種假設寡婦在任何交易中都是輸家』的法律環境，並且在敵對的男性事業中成功。歐康諾的小說中展現了一個對寡婦們而言依舊默默存在著類似艱辛的現代南方。她的寡婦們……都有著一種對災難的恐懼盤桓在她們的意識邊緣。這種恐懼是在掠奪勢力下勉

強殘活的她們，對這種勢力的防衛性理解。(Westling 146)

朱力安的母親辛苦地扶養他長大成人，這是她的驕傲，因為她是在對寡婦十分不利的環境中做到了，但是同時這驕傲也使他變成取代家庭中男性／父權而成為掌握大權的母親。母權的高漲使朱力安的地位更形微小。家庭中由母親行使威權在強調男性優越與優勢的南方是怪異不自然的，這也是朱力安因羞愧自慚轉而嘲笑奚落他母親的部分原因。

三、個人與社會的想像空間

在整體空間的研究中，我認為應該要討論並包含生活空間中的歷史反省性，才有可能增進並容納空間的多元意義再／生產。列斐弗爾所指稱的第一部份「空間演練」(spatial practice)在實質上僅是一個空間的操演，缺乏反省性，並不能將地方或空間中的迷思做探討或解讀，所以只能是所「見」與「感知」的部分。這個「空間演練」因為只是一種歷史傳承的見證與召喚，所以人們據此而感知與操演的空間是不具反省力的。而第二部份「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因為是各式知識型態的概念空間，其中知識的邏輯形式與意識形態化的各種社會建制形式，也正是侷限與窄化人的思維與行為的主導。只有在第三部份「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人們才有可能重新探究歷史傳承下空間操演的「歷史性」與「慣常性」背後的認知規則與建制，並因此能對實際生活中的象徵與符號進行解讀與反省。因此舉凡

在空間中的建築結構、都市景觀、社會的種種建制規範、以及因此而建立各種感知的經驗，都要在空間再現的範疇中加以解讀反省。於是有關社會空間的個人想像與這個社會空間中匯聚的種種可能的論述都將是這個「再現的空間」、這個社會的想像空間的來源。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將「再現的空間」概念深度化，來做為前兩類空間(歷史的傳承與意識規章的概念化)的一個平衡點，而也同時擔當起這兩類意識形態宰制下的一個可能的出口。於是建立辯證關係與深度化之後的「再現的空間」，不僅是要將存在於個人想像空間中的社會關係呈現出來，也將提供一個挑戰既定想像關係的空間，並經由對社會關係的空間解讀、重組、甚至再解讀，來顯示整個空間中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或意識形態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

如果我們用「再現的空間」觀點來看歐康諾的小說，則可以發現小說中人物所呈現出的社會人際關係主要是來自於他們對個人所處的環境與整個社會文化和家族歷史的關聯性。人對存在的立足點的感受是來自於人與其環境的關係，以及在此環境中人和其他人的關係所形成：「共同的經驗和利益形成對某一特殊的地方——匯聚了持久的社會關係的地方——的一種感情的依戀與自我的界定。這就是在地身份(local identity)或地方感(sense of place)」(Agnew 58)。而屬於特殊場所的文化也因此能在人們對特定地方產生情感的認同時一起被接納與認同。人對環境中的關係及對人物的認識、體會與認同，使人的生活充滿意義並且得到與社會共同的存在意義與精神。這正是場所的精神，是空間所賦予的，一個地方的場所精神。這樣的精神是經由許多不同的管道被個人體驗而得，所以除了歷史與政經社會的背景之外，個人的

體會、反省與詮釋亦決定了這精神的標的。它可以是心靈的慰藉、寄託，也可以是逃避的處所。正因為這樣的空間是隨性而至，不受時空限制的，所以它比公共空間對個人具有更多的影響力。

歐康諾小說的敘述者在描述主角朱力安與其母時，就特別強調他們的個人想像空間。這想像的空間所呈現的即是他們兩人對同一場所所具體詮釋的意義與兩者之間的差異。家居環境對家庭成員所產生的參照架構的形成，以及此成員個人認知和活動的導引，是建築的空間和其環境所扮演的社會功能。所以同樣是家族過去所擁有的房舍，對母子兩人的影響卻因時空的不同與歷史的轉變而大相逕庭。過去蓄奴時期代表南方主人權勢與地位的房屋成了現今朱力安母親緬懷過去的重要根據。一個人對環境的印象是「立即的感知和對過去經驗的記憶的產物，這樣的印象將被用來詮釋資訊和導引行爲」，而「一個對環境形成的好的印象給予它的擁有者一種重要的情感上的安全感。他可以在自身和外環境間建立一種和諧的關係」(Lynch 4)。所以想像的空間，尤其是家的甜美印象是最強烈的情感安全的來源，也是人據以生活在現實中的依據。對過去美好生活的印象，尤其是家庭所帶給她的安全感與尊貴榮耀，正是構成朱力安母親情感上的寄託與依靠的來源。而這樣美好光榮的景象則是具體的展現在家族豪華的住宅建築上。屋宇的建築空間突顯了居住者的身份、地位與權勢，也同時成為這些抽象概念的表徵。所以過去的榮耀與輝煌，過去南方白人的優越與威權，過去黑人對白人的唯唯是從，以及過去她做為大小姐時所擁有的一切驕傲與矜持，如今都必須要藉由她腦海中對這幢房子的回憶來加以強化才行。因為過去的富裕榮華反映在房屋上，所以只有在回想中，朱力安的母親才能重新拾回她情

感的安全感：

我還記得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時去過祖父家。那棟房子的大廳的兩側有著樓梯通往真正的二樓——烹煮一類的事全都是在一樓。我習慣逗留在樓下聞廚房的味道。我坐著將鼻子靠在牆上深深地吸著氣。事實上這地方是屬於高亥家族的，但是是你的祖父雀斯特尼付的貸款，才替他們將房子保留下來。他們的生活情況是有些緊縮，大不如前。但是不論是否情況拮据，他們都絕對不會忘記他們的身份。(408)

這屋子的重要性不僅僅是一個富裕家族的權勢表徵而已。它還向朱力安母親明白地彰顯著，即使生活拮据，經濟情況大不如前，也仍然要記著自己的身份、地位。這房子的存在就是這身份地位的表徵。而事實上這房子本身的建築空間就明白地顯示出南方黑白階級分明的意識形態：所有黑人僕人的活動(如煮飯)是在低下的一樓進行的，而白人主人的活動空間，則是在高聳的，上面的，「真正的二樓」。因此朱力安的母親必須在現在的時空中固守著這舊屋宇所存留的記憶，也才能堅持遵守這記憶中藉由空間再現的身份迷思，然後繼續保有過去的光環。

「你的曾祖父是這個州的前州長，」她說。「你的祖父是個富有的大地主。你的祖母出身名門，是高亥家族的成員。」

「你能否看看你的周遭，」他用力地說，「看看妳現在

在哪裡？」……

「你還是你，」她說。「你的曾祖父有一個莊園和兩個黑奴。」

「現在已經沒有黑奴了。」他忿忿地說。(407-8)

同樣的南方，但是不同的歷史空間與教育，使朱力安與母親有著極大的不同。朱力安的母親堅持地固守並維持過去的教養所賦予她的認同：「淑女們是不會洩漏她們的年齡與體重的」(405)。「如果你知道你是誰，你就無往不利。公車上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我們這種人，但是我可以優雅地對待任何人。我知道我是誰」(407)。正因為朱力安母親永遠不會忘記這樣的身世背景，所以即使她已經不再是大小姐，也不再有黑人僕人，她仍然堅持她所應遵循的淑女傳統：穿戴整齊的參加任何場合。她絕對不會因為家道中落而放棄維持她的尊嚴。她也被教育要保持她的高貴風範，所以即使「減重班裡大部分都不是我們這種人，但是我可以對任何人表示和善。我知道我是誰」(407)。在公車站，「她戴著那頂可笑的帽子端正筆直地站在那裡，彷彿那帽子就是代表著她想像的尊嚴的旗幟」(409)。但是對朱力安而言，這種儀式是過去文化意識的殘留，是不合時宜的；更何況現在他們已經家道中落，不再有過去的尊貴地位，也不再蓄有黑人奴僕。他的祖先蓄養黑人奴隸的事情並不能使他感到光榮，畢竟蓄奴一事已經成為歷史的污點，而且相對於他現在的窮困景象，過去祖先們的光輝模樣反而使他感到更加自慚。但是他的母親卻總是不斷地提醒他那段他來不及真正享有，卻必須成為負擔的燦爛日子：「你的曾祖父擁有一大片耕地和兩百名奴隸」(408)。他的母親就完全沒有他的內

疾，反而對往事仍念念不忘，一點也不覺得蓄養黑奴有何不當。朱力安只得提醒她「現在早就已經沒有奴隸了。」爲了要與他的母親作對，讓她知道她那一套南方名媛淑女的派頭在現代的時空是不相稱的，朱力安故意拿下他的領帶，挫挫他那戴著「自尊」帽子筆挺驕傲的母親的銳氣，讓她因見到衣著不整的兒子覺得很沒面子：「你爲什麼一定要在帶我進城的時候打扮成這樣？你爲什麼故意要使我難堪？」朱力安的回答是：「如果你永遠都不瞭解你身在何處，至少你可以瞭解我是身在何處」(409)。

從空間認知的觀點出發，所謂「好」的環境印象其實是因人而異的，但是「這印象最好應該是開放式的，能隨變化而更適，允許個人去持續探索和組織現實：它應該有空白的空間讓人自己去擴大他的圖樣。最後，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與其他人溝通。」(Lynch 9)若以此觀點來檢視朱力安母親對舊屋宇的回憶印象，我們不難發現她的情感安全是建立在封閉的印象之中。正如朱力安所說，她是活在她自己的幻想世界中，而幻想世界之外的地方她則從來也未曾駐足。(406)。所以她的自我認同便只得停留在過去式的富裕與出身高貴的血緣身份中、停留在高貴出身的虛幻認同與淑女儀態的自我尊重(亦或自我欺騙?)之中。這棟早已失去的歷史舞台是舊日南方種族歧視與階級意識的痕跡，正是年老、卑微、窮困的朱力安母親所想要牢牢抓緊的舊日光輝。

相對於他的母親，朱力安對這棟房子的眷戀是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對這舊宅第的印象已變成他的想像。這個記憶中印象屋宇的再現空間是他的避風港，他心靈的寄託，也是他療傷止痛，重拾知識份子的自信與驕傲的空間。所以當他與母親在公車上發生意見爭執時，他就「再一次退回到那有著高聳天花板，零散擺

置著大型古董傢俱的房間。他的靈魂在剎那間膨脹擴大，」然後，他才能「冷靜地審度她」(413-14)。經由對這幢舊屋宇的神遊，朱力安才能重新拾回高尚的身份，得以再次誇示做爲知識份子的驕傲，因爲在這現實功利的社會中，他的身份、地位都不是經由學識或家世來評斷。自許爲一個知識份子，朱力安看不起他的母親凡事都要牽扯上黑白之間的問題，也不認爲黑白之間的消長應該用舊式的黑白關係來衡量。但是他也一樣沒有能擺脫他母親向過去汲取高貴身份認同的舊習。他暗中依舊對舊日血緣身份感到驕傲，而對這棟代表舊日地位表徵的大宅第就更加感到自豪。於是，在現實世界中失意的朱力安，用新時代知識份子的身份混雜著舊時代高貴身份認同的驕傲，將黑白之間的問題以更細緻的方式呈現出來。

在分析朱力安母子對現實的逃避時，吉安諾指出朱力安的母親必須躲在歷史的陰影中才能找回她的尊嚴，而朱力安則是利用黑人來排斥他的母親與躲避他的責任(Giannone 163)。吉安諾認爲朱力安母子都一樣選擇逃避現實，並利用黑人來建立自己的尊嚴。我認爲這樣的說法是可以經由探尋小說故事中的空間——空間的歷史記憶、傳承與想像——來更進一步說明。但是另一方面，我以爲吉安諾的說法將朱力安對黑人的看法解釋爲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這是忽略了朱力安作爲知識份子在南方所面臨的歷史與自身的困境。在此處，朱力安的母親是傳統南方白人的種族歧視與階級文化意識的接收者，也是這種教化與信仰的傳遞者，但是朱力安其實也是有他知識份子的侷限，而這侷限並非只單單緣自於他想利用黑人來貶抑母親。雖然他自詡他對黑人絕對沒有他母親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然而他卻只想結交高級的(或者是

夠資格的，有足夠智識能力能和他平起平坐的)黑人的這種想法，卻仍舊是將黑人做了區分：只接納他所認同，或者，可以利用的那一部份。朱力安依舊沒有因為自詡為新時代的知識份子，而有能力逃脫將黑人區隔化的框架，而這其實也是他用以批判母親的著力點。

這位在現實社會中收入微薄的打字機銷售員必須重回舊日時空，在舊日屋宇中吸取過去南方建築空間呈現的高雅文化，以及這文化所透露出的，非現實功利的空氣，才能將他原本不被功利社會重視的、屬於知識份子的小小靈魂膨脹起來。他是以其所自以為傲的知識份子的觀念來評判他的母親。但是這舊房舍對他的意義其實仍然是舊有南方階級意識的翻版。他認為他比他的母親更能理解這棟房子，也更能欣賞這棟房子。但是他所謂的更能欣賞這棟房子其實是意指他比其母更能體會這房子所代表的美學與文化意義。而這建築空間所散發出來的美學、文化意義與氣息其實亦是立基於舊日白人政經權勢的運作與維持，以及依賴奴隸制度而獲致的經濟與勞力基礎，才能建立這房子本身所具有的濃厚南方文化色彩的富麗堂皇。即使他在房子被賣掉前只見過這房子一次，而且那時房子大廳正面的兩道樓梯都早已腐爛傾頹了，黑人都住在裡面了：「他站在寬大的玄關，傾聽橡樹葉發出的窸窣聲，然後徘徊穿過有著高聳天花板的大廳，進入客廳，看著破舊的地毯和褪色的窗幔」(408)。雖然如此，這房子卻仍常出現在他的夢中，風貌猶存，一如他母親所見。然而對這舊宅的懷念只是相對地使他目前所住的地區更形破敗。他無法改變現狀，無法擺脫對過去家族所曾享有的歷史的懷念，但是也無法再造光榮於現在。所以，不論是朱力安或是他的母親，都不把他們

的家，他們目前所居住的地方，當作他們感情或認同的中心。因為當前的公寓既缺少傲人的氣勢，也無法展現令人折服或引人認同的建築想像空間。

朱力安認為他目前居住的地方，一棟棟的公寓擠在一起，像是「同樣骯髒、盤結的豬肝色怪物」，「每棟房子前面都有狹窄的一圈泥土，通常這泥土地上都坐著一個髒兮兮的小孩」(406)——這醜陋的怪物和它的環境相對於他記憶中典雅富麗，深具高貴文化氣息的舊日房舍而言，對他的情感與理想簡直是一種可怕的折磨。這樣粗鄙的房舍，就像鏡子般反映出他家庭的貧瘠與卑微。這樣的房屋是完全不能襯托、反映，甚至代表他的心智與才情。所以這些「醜陋的怪物」當然得不到他的欣賞，更別提「認同感」、「歸屬感」的產生。所以他認為如果他有能力能開始賺些錢，第一件事就是搬家。朱力安認為他所居住的環境不但反映出他家庭的卑微，而且也對他生活行為與思想有所限制和圈圍。正如列斐弗爾所言，「要改變生活，我們必須先改變空間」(Lefebvre 190)，因為空間的改變會使人對過去習慣遵循的想法與作為做出反省與更動，而若能因此對過去的習慣與想法加以反省檢討，才有機會進而因空間的改變而達到生活與思想的改變。朱力安並不滿意目前居住的這個簡陋與卑微的公寓在空間的意像上所代表的意義，所以他想要搬家，離開這個代表重重限制的地方，尋找自己的住所和環境。如列斐弗爾和林區所指出，經由家的空間的改變，家庭成員因家庭空間而建立的方向感，與環境的互動關係，以及他們的自信、認同和歸屬感都會因之而有所變動。所以他必須時時回到那僅見過一次的豪宅，彷彿只要在其中他就可以盡情伸展，吸取能量，表現才情。這記憶中的印象與想像中的屋宇和

它所代表的建築與週遭環境的氛圍所構成的景色，已經和整個歷史時空與意識形態糾結合一，成為人身份能力的代表。舊屋宇的尊貴氣氛和建築文化美學讓他有一種身份認同的假像，也因此能使他那被現實環境與工作型態給重重壓縮的小小卑微知識份子的靈魂得以伸展擴大。這建築空間所賦予人的想像正是列斐弗爾所指出的，環境空間的力量：

地景(landscape)的力量並非來自於它們將自身做為一個景象(spectacle)來呈現，而是來自於它一如鏡子和海市蜃樓，能為任何一個可能的觀看者提供讓這個主體(或自我)在絕妙地自我欺騙的時刻，宣稱這個既真實又虛假的，具有創造才情的形象就正是他自己。(Lefebvre 189)

這種反映主體形象、身份、地位的功能就是地景、社會空間、居住環境，甚至小小的建築空間都具有的一種抽象的象徵力量。所以不僅是朱力安母親，連朱力安本人也是必須要在地方的認同上回歸到舊有的尊貴住屋而非現今的破舊公寓。其實朱力安母子對舊宅第的認同是一致的，有差別的是他們對現實住屋的態度。朱力安對現實居住的環境與住屋所反映出的印象感到痛苦和不滿，而他的母親對這樣的公寓並沒有感到什麼不妥。她管這叫「能適應環境」(409)。事實上她之所以能無動於衷是由於她真正的「家」，她情感的中心，仍然是繫在那古老的屋宇和黑人奴僕的照應上；再者，她也不會真正看清她所處的時空，而仍然沉迷於，甚至是困於舊日的南方時空之中。所以她不必為目前房子的簡陋

感到痛苦。她無視於現今破舊公寓的鄙陋，因為她沒有認同或歸屬的問題。但是朱力安卻有現實與回憶、認同與歸屬、想像與實際生活的問題。儘管現實狀況令人難堪，回憶的空間對朱力安而言卻是真實與甜美的。只有這棟家族榮耀表徵的舊豪宅才是朱力安和他母親真正心靈的寄託。即使兩人所有的文化意識形態與所接受的新／舊南方教育的影響是不盡相同，但是代表著過去舊時代精神的屋宇，卻在無形中，透過他們實際到訪的經驗而賦予兩人一種屬於舊日的風光與文化意識，並轉化成為他們日後內心的情感與認知的支柱，進而成為身份的表徵，這主要是由於這屋宇所代表的精神與文化意涵能夠在他們的想像空間中具體化並且被運用到生活中產生作用之故。

但是現實世界裡的朱力安母子關係卻是充滿了對抗。朱力安對他母親的種族歧視行為感到恥辱，於是在公車上故意坐到對面的黑人旁邊，與他的母親形成衝突對峙的姿態，也趁機讓他的母親更加看清楚他不想妥協的態度與他對黑人的認同與支持。正當他幻想著如何結交高尚黑人，或有個黑人女友，或者是在他母親病重時找個黑人醫生替她看病等時，有一對黑人母子上了公車。黑人小男孩爬到他母親旁邊坐下，而黑人母親則是擠近他的身旁。這種位置的安排令他母親感到非常痛苦。她的臉幾乎變成灰色，眼神呆滯，彷彿突然間「她和那黑女人竟然調換了兒子」(415)。這黑人母親和朱力安的母親一樣，對自己孩子竟然跑到另一邊去(白人那邊)，甚至想逗弄朱力安的母親和她玩，感到非常憤怒，於是兩度嘗試將掙扎的小男孩抓回到身邊，直到最後小男孩被打得大哭並且屈服於她後方才罷休。在此處我們可以發現不論白人或黑人母親對於彼此之間的交雜相處(坐到對方那一邊

去)仍然有極大的不認同。

但是這個插曲卻讓朱力安感到刺激,尤其是這位黑人母親竟然和他的母親一樣,都戴著同樣一種低俗可怕的帽子。可是朱力安母親卻無視於黑人母親戴著和她一模一樣的帽子,只是「笑一笑彷彿把她當成是個偷她帽子的猴子」(416),因為她相信黑人母親畢竟身份地位都不如她,就算戴上和她一樣的帽子,也是無法與她相比的。而她之所以能和黑人小男孩在公車上玩,甚至還主動向鄰座有著暴牙的白種女人表示這個黑人小孩很可愛,主要還是因為「她對黑人小孩或白人小孩都一致地認為他們很可愛,並未有意識地嘗試去做什麼黑白的區別,甚至還認為黑人小孩更可愛」(415)。因為黑人小孩的可愛天真,朱力安母親暫時收起她的種族意識與階級概念,和他玩遊戲。但是針對朱力安坐在黑人旁邊這件事,她就不能等同視之。其實不僅是朱力安母親不願意他坐到黑人旁邊,黑人母親也一樣不願意見到自己小孩坐到白種女人身旁,更別提兩位母親都不願自己的小孩與膚色不同於自己的人交往。即使是黑人小男孩卡爾佛與朱力安的母親玩躲貓貓的遊戲都使他的黑人母親火冒三丈。

朱力安母親和這位黑人母親是彼此的一面鏡子:不僅在外貌上有著相似點(頭上都戴著相同款式的帽子),也都有一個想逃到/跑到另一邊去的兒子,而且在某些觀念上她們也是有著相當一致的看法——同樣都對自己的身份與尊嚴有著高傲不可侵犯的態度。惠特認為,這黑白兩位母親所帶的帽子「在字面上與比喻上,都變成了故事中的聚合點」(118)。但是我認為這樣的「聚合」只是一個模擬的假象。她們對黑白種族間差異的看重,使她們宛如彼此的鏡像,但是互為鏡像只點出她們的相似處(戴同樣的帽

子、同樣擁有高度自尊、強調種族差異),並不代表她們兩人能夠真正認知到黑白種族間的共通性與共同性,更別提黑白可以和平共處、如在神之中、親愛共治於一爐。這就是我認為必須真正對第三部份「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中個人與社會想像空間等論述(請見本文第三部分)做進一步深刻檢討、反省與確切體認,才有可能產生歷史的反省力。我認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進入歐康諾帶有宗教天啓式的「聚合」概念。

正如白人無法抹去意識中的優越與對黑人侵犯的警戒,對於長久被壓迫的黑人而言,歷史上的錯誤其實也並未能立即隨著法令與政治的修改而被遺忘,他們對於白人的警戒心也無法立即削減。界線的存在在過去是藉由公共空間的區隔來教化與確立,如今則是假借殘存的意識形態在人們的內心向人召喚,並將之重新實踐到生活之中,用以產生再現空間,進行權力、種族、階級、性別、文化的再界定。所以當黑人小男孩天真無知地與白人嬉戲,完全沒有人種的隔閡時,他的黑人母親卻大不以為然。公車上的座位對白人或黑人而言,不但有其空間的差異與區隔,還有位置(place)的差異與區隔。因為空間與自我/自身在這裡是一體的,空間中位置的分佈不再是單純的隨機關係,而是做為一種明白的彰顯:它賦予人們尊嚴,它代表人們的地位與身份,它顯示的是人們在世上的位置,以及他們對環境社會空間的認同、對場所的認同。區隔空間的取消是彰顯黑白種族在空間使用上的平權,但是在空間的實踐上這樣的感知空間所顯現的僅只是表面的現象,真實的生活故事則必須由兩位母親的態度來察覺。所謂取消空間區隔對這兩位母親而言,都只能止於「共同」擁有這個空間,但是不可以越界。白人在這邊,黑人在那邊。空間可以共有,

但是位置不可以混雜，身份不可以認同。正是如此，兩位母親同款式的帽子與同樣喜歡跑到「另外那邊」的孩子都只是反諷地提醒著讀者這黑白兩位母親共同的偏差思想，因為「帽子」的「巧」合，只是表象／假象。

雖然朱力安母親與黑人小孩的遊戲似乎說明黑白間尚有可能暫時泯去差異，但是這也僅是表面與暫時的假象。當朱力安母子與黑人母子都正巧要在同一站下車時，朱力安害怕的事果然發生了：他的母親照慣例又要拿出一個銅板賞給黑人小男孩。愛德蒙生認為朱力安母親給黑人小男孩銅板是一種親切(kindness)的行為(Edmondson 119)，但是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明顯忽略給黑人小男孩銅板在南方所代表的意識形態認知與種族歧視。朱力安母親還活在她自己的幻想世界中，以為黑人都是比她地位低下的奴僕階級，所以她想給黑人小男孩銅板的行為正象徵著她做為白人對普遍的黑人所背負的保護、援助、施捨的義務。只是這樣的行為在時空變動的狀態下，不但暴露出白人的驕傲與階級意識，還再度提醒著黑人母親整個歷史上白人對黑人的奴役與不義。施捨銅板給小男孩的動作彷彿再度告訴這個黑人母親，即使他們已不再是奴隸，已經可以與白人平起平坐，她的孩子的地位仍然是比白人低下，仍然要因為他的小可愛及聰明，而得到白種女人的賞賜。對黑人母親而言，這種施捨的行為就是最大的侮辱，是白人再一次在公共場合中貶低黑人的尊嚴。朱力安母親這樣的行為彷彿是要在她那年紀尚小的孩子身上烙下卑微低下的印記，雖然「這動作對她(朱力安母親)來說是像呼吸一樣再自然不過了」(417)。但是她根本忘卻了城市的這個區域是黑人們的區域，是黑人母子的家的延伸。黑人母親對朱力安母親竟然在這樣的地方

向她及她的小孩展示白人的驕傲當然是感到怒不可遏，因此她選擇了最自然的防衛與反擊方法——拿起她鼓鼓的手提包重重地打到朱力安母親的頭上。這憤怒而致命的一擊是黑白間意識與想像隔閡所造成的悲劇。朱力安母親對夜晚城市街道的恐懼與威脅的想像終於成真。開放的街道比半開放的公車空間更具危險性。只是這黑夜中城市街道所醞釀的危險依然是與黑白種族間長期以來的歧視與差異有關。社會空間經由各式文化、經濟、政治的力量得到重塑，而社會空間中的人際關係接著也會隨之改變。然而朱力安母親因為無法隨時空轉換而變更她的行為與思考方式，於是成了南方種族、文化意識和淑女教育下的一個悲劇例子。

四、空間多重性

歐康諾〈凡興者必合〉這部小說的敘述是不斷穿梭在朱力安與其母的衝突之間。而這對母子在意見、想法與做法上的衝突，在文本中則主要是以公車這個公共空間來作為展現的場景。文本的主線敘述是有關母子兩人在現實生活和想像空間中所呈現的意識形態的認知差異和想像與現實中意見和行動的衝突。這是歷史的過去與政治的現在所引發的關於意識形態、角色扮演與所居立場上的認同與差異。小說敘述的最後則是將主要場景公車中所出現的黑白衝突移置到公車外的城市大街上，進行衝突的解決來做為最終故事文本的總結。小說文本空間的敘述策略是沿著住家往外走到公車站，然後是公車上，最後又外延到市中心的街道這樣的空間安排來移轉的。而文本空間敘述的副線則是進行對故事中主要人物朱力安的想像空間做描繪，並經由朱力安想像空間

中的批判觀點，暗中浮現朱力安母親與朱力安母子兩人新／舊南方意識在看法與思想上的差異與共通點。而故事敘述空間的主要場景公車，更讓這樣的母子衝突在黑／白種族、階級和身份的議題上引爆。故事中敘述者有限的第三人稱觀點在暴露出朱力安片面但獨斷的想像與批判的同時，也有利地呈現出敘述者的評判。而歷史時空的轉變所帶來的檢討批判其實亦是小說中人物朱力安所自豪並具以評斷其母，希望她能「真切地」「知道自己的所在，所處的狀況」的新南方意識觀點。小說的文本敘述空間所鋪陳出的場景與衝突正深刻點明這一點。空間永遠是社會性的空間，而人所處的空間其實亦正是歷史社會的產物。

這樣的社會空間與型態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空間在政治與經濟的權力場中，扮演的規範、限制與教化的功能。歐康諾的小說人物們在這樣的空間中不斷地互動與衝撞，扮演著微小但意義深厚的空間挪用、更動、改造與再生產的可能。這個社會空間既是社會的產物(Lefebvre 30)，也製造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與活動，並得以產生再造的空間。唯有在了解社會空間對人們生活與思想的形塑與限制之後，人們才有可能經由對此一社會空間內的禁制與規定做認真省思，而達到製造爭議、反抗，進而扭轉空間、製造空間，甚至改造空間的可能。

社會空間並非一成不變，因為社會空間能容納，影響並限制人際關係，也因此能被重新再造。社會空間中的關係因為有秩序與法治的約束力，所以也同時暗示著無秩序和暴力的存在，而這些力量間的緊張關係既是空間的產物，也是再造新空間的力量。〈凡興者必合〉小說文本的敘述空間亦隨著小說內人物的想像空間的增生、改變、甚至轉化而不斷地開展、擴大。首先，小說文

本的空間敘述是由具有血緣統一性與個人私密性的白人住家向外開展到具有社區統一性的貧困白人公寓住宅區，然後是公車站，接著再進展到半開放，黑白混雜的公車空間，最後則是進入全然開放的公共空間——黑人聚集的城市市中心大街。若從顏色來看，文本的敘述空間是由白色轉向黑白混雜而最後變成黑色。換言之，朱力安與母親其實是經歷著由白人中心的密閉私人世界逐漸過渡到黑人為主體／多數的開放城市中心的遊歷過程。而同時，這也是一次歷史的檢閱。文本敘述的空間轉換過程正是朱力安所處的南方小鎮黑白種族間所經歷的共同歷史：以破敗了的貧窮白人社區來代表沒落了的，由白人主宰、黑人奴僕為輔的蓄奴經濟社會，轉化為解放黑奴的過渡社會，以及最後在歷史的轉變下，小鎮在意識形態上取消在公共空間裡對黑人的禁制，由對黑人種族／階級歧視空間的解除，承認黑人與白人的共存與共有平等空間的政治社會。然而朱力安母親就無法體會到此點。她所受的教育如此的忠告著她，所以她也同樣地警惕著朱力安：「只要你知道你是誰，你就無往不利。」但是事實上她當下的歷史時空卻早已全然不同，所以即使有著高貴的身份，做出合宜的舉止，目前的她也仍舊是「那兒都不能去」：既走不出她想像中的南方時空，也走不到、進入不了夜晚的城市大街(除非有朱力安的陪同)，甚至必須喪命在這樣的邊緣地帶(即使有朱力安的陪同)。雖然歷史已經走過從前，並且在社會空間的安排上放棄濃厚的白人中心主宰的意識觀點與教化，但是新平權空間與這樣的社會空間特性卻勢必需要更長的時間，甚至更多的寬容、諒解和智慧才有可能進行真正的空間社會性的改造與轉化。歷史所遺留的問題並無法立即因為政治力的運作而泯除，所以才會在故事的最後引發

兩位母親的衝突。兩位母親的問題和朱力安母子間的問題(甚至黑人小男孩卡爾佛和他的黑人母親間的問題)，都是由身份所引發的更深一層的種族、階級、性別、新／舊南方的問題。黑白兩對母子對於他們所處的時空有著不同的解讀，也因此抱持著不同的地方認同、身份認同與歸屬感。但是當這些各有觀點的人物相聚在同一個空間時，他們之間的關係與互動卻深刻地影響到他們的社會空間、他們的人生。

在故事的最後黑人母親給朱力安母親一拳是因為她反對朱力安母親給小男孩銅板所表達出的潛意識裡南方傳統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與歧視，而且這樣的暴力的確帶來朱力安母親無法承受的打擊，但是這一拳卻很諷刺地沒有將她打醒，反而是再度將朱力安母親打回到過去，讓她再度成為依賴黑人保母的小女孩。當她遭受黑人母親的打擊後茫然不知地一腳高一腳低地向前走時，朱力安問她要去哪裡，她的回答是她要「回家」(home)，「叫祖父來接我」(420)。因為只有她祖父的華宅和這宅第所代表的那一切才是她真正的「家」。破舊的公寓不是她的「家」。她的家、她的寄託、她認同的是她一直無法忘懷並深深依賴著的過去：有著種族偏見的南方，蓄奴的優渥家庭生活，過著南方驕矜高貴生活的雀斯特尼家族。但矛盾的是，有著種族偏見／歧視色彩的她卻又堅決相信她的黑人女僕夏洛琳對她的愛護與照顧，以至於夏洛琳似乎在她的意識中竟脫離了她帶有南方種族歧視的潛意識下那幫不能和白人平起平坐的黑人印象，成為一個單獨的個體，超越了她印象中黑人奴隸們卑微低下的集體形象，成為一個她在情感上依賴至深的保母／僕人。

在蓄奴的南方觀念裡，家裡的僕人是不同於外面工作的農奴

的。史特林(James Stirling)在研究南方家奴與農奴之間的區別時曾指出：

在判斷奴隸的福利時，區別奴役的不同情況是必須的。在考慮到奴隸的人數和對奴隸福祉的影響時，最重要的區別是在於家庭僕役和農場／田地奴隸的不同。家庭僕役比較上來說是較於富裕的。他通常是在他所屬的家庭中出生和成長；即使不是這種狀況，由於奴僕和他的主人以及主人的家庭的堅固聯合，自然地導致他們能享有好的待遇。在這情形下並不缺乏主僕雙方互有深厚感情的例子。在主人方面這樣的感情甚至會轉變成過分的寬大與縱容的危險。(Stirling 107)

朱力安母親對黑人的刻板印象主要是來自種族偏見與蓄奴文化的轉化，所以她很自然地將黑人等同於在田裡工作的農奴，將之視為工作卑微低下的異己。但是現實中的夏洛琳則因為是家庭保母的地位而脫離她腦袋中黑人異己的想像，不再是卑下的異己。也因為夏洛琳和她朝夕相處的關係，她對夏洛琳是有著相當深厚的感情的，所以夏洛琳雖然具有黑人的身份，卻成為保護她本人與她舊日南方尊嚴與想像的人。所以當她面臨到生死交關之際，她又再度回到了過去，尋求她唯一能依賴與下命令要求給她保護與照顧的黑人保母夏洛琳：「叫夏洛琳來接我」(420)。她對夏洛琳的依賴其實乃源自她內心對夏洛琳的信任，而這信任正是對夏洛琳所給予她的，作為保母對所照顧的孩子所給予的那種毫無保留的照應的回饋。做為一個黑人女僕，夏洛琳的愛心超越了黑人

與白人的界線。在這裡我們初次見到了跨越界線的「合」的狀態。這樣跨越種族色彩寬大無私的愛是朱力安母親和黑人小孩卡爾佛的母親所缺乏的。她們都無法在意識上解放她們的情感，也都被過去舊南方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給綑綁而陷入同樣的陷阱。她們將這樣的種族意識帶入生活而不自覺，同時她們也沒有自省的能力，所以只能讓這樣的黑白衝突的種子在公車上擴張到極點，而最後這樣的相互不信任與敵對的狀態在朱力安母親不自覺地想對小男孩卡爾佛表現一些善意時，那種白人優越的，南方淑女對黑人小孩的賞賜與恩寵的行為就成了引爆點。黑人母親的這一拳是要求平權與尊重的，帶著反抗的負面力量，但是這暴力的背後，正是黑白種族間不能諒解與跨越界線的表徵。這是黑人向白人發出的怒吼與挑戰，也是黑人要求白人給予平等看待，並據以抗爭白人壓迫與歧視的忿怒力量的展現。黑白之間的歧視與抗拒，展現在兩位母親的行為與思想上，因為在她們的心中，原有的新／舊南方意識的界線是深刻而無法跨越的鴻溝。

然而不論是母子間的衝突或是南方新／舊世界間差異的鴻溝，都是必須要用無私的愛、尊重和體諒來化解的。而朱力安的母親在最後臨終時想要在朱力安的臉上尋找的，正是這母子之間最深厚、無私的愛與諒解。母／子，黑／白，新／舊南方意識，與新／舊世界意見的鴻溝需要橋樑，才有「合」的可能。然而這樣的工作是不能僅僅依賴知識、法規與教訓來執行。這是朱力安所受的教育與意識形態所無法幫助他認清的，然而母親的死卻迫使著他必須要獨立去面對這個課題，雖然他在故事的最後也許已經有了些許認知。所以他才會在突然意識到他母親可能棄他而去時，深切地哭喊著「母親」(Mother, darling, sweetheart)。這是他

一直以來都不願意說出口的稱謂，也是他無法面對也無法表達的，對他母親所做的犧牲奉獻的承認與尊重。然而死亡迫使他不能再逃避，讓他在母親臨死前給予她應有的尊重與稱謂，在面對她偏狹的所作所為時用愛與寬容，而不是用訕笑與沉默，去接納他的母親，寬恤她那不合時宜的舊想像，體諒她對待一般黑人的狹隘種族觀，與對他的未來所抱持的天真而無可救藥的世界觀。這樣的反省，尤其是對愛的重新認識與思索跨越空間界線的可能性將會是他日後更重要的功課。但是跨越界線卻會伴隨著醒悟的罪惡感和痛苦：因為只有當他走出自己的想像空間嘗試去了解他的母親時，他才有可能反省與意識到他自己所犯的錯誤。所以當「他哭著跳起來跑向前方燈火聚集處求救」時，故事的敘事者語重心長地提醒道：「黑暗的潮水似乎要把他捲回她的身旁，一刻又一刻的延緩他進入罪惡和苦痛的世界」(420)。

歐康諾給這篇小說的標題〈凡興者必合〉點出了這樣的問題，這個不同衝突和觀點間越界的可能性，也同時讓故事中最後的暴力事件變得充滿悲憫。歐康諾受到德·夏丹的神學神秘思維與對宇宙萬物生命行為的宗教性救贖與解釋的影響，將這樣的看法融入她的小說中，讓她的人物最終能對世界有某種程度的體認，而這種體認當然是與朝向神做為最終聚合處的觀念相關聯。社會空間既然是社會成員所共有，就不能避免權力衝突，但是各自畫定界線，不能跨越彼此間實際或想像空間的結果，只有造成更多隔閡、厭惡與憎恨。歐康諾藉由宗教的觀念——天主教神學家德·夏丹的宇宙聚合論，以世界上的人、事、物皆會在生命最終的某個時刻統合於神無私的愛之中的聚合觀念做為宗教所帶來的最高啓示，讓〈凡興者必合〉的標題充滿宗教神學的意涵，

也使故事敘述的最終結局在充滿衝突、佈滿界線的社會空間中有突破的機會，使互有認知差異與錯誤歧視的人們能夠尋找可以成爲一個社會群體的共同點，能寄望去覓得一個可以越界的可能空間、一個「合」的空間。

但是除了這個經由費茲傑羅在小說集的介紹中所開啓的宗教性啓示與詮釋說法之外，我認爲歐康諾在〈凡興者必合〉中敘事的手法與重心其實並非僅只是宗教宣揚，而是藉由小說人物與故事發生的場景突顯出城市空間中種種個人、家庭、性別、族群、社會的衝突與壓制的情非得已，以及發掘、檢討、批判、反省其背後可能的歷史因素與社會的意識、訓育與傳統沿襲，而這正是林區所指出的環境的影響力與人對環境的認知與個人對環境所興起的地方與身份認同所引出的空間議題，也是列斐弗爾所說的，社會與政治的衝突會在空間的矛盾中顯現(Lefebvre 73)。也因爲空間本身即是多重的，它既是整體也是碎裂的(fractured)(Lefebvre 356)，所以歷史傳承的、政治訓育的與個人實踐的空間領域才可能同時並在，也才有可能在碎裂處進行反省、挪用與改造。所以歐康諾〈凡興者必合〉中的種種空間的混雜交錯，也許能讓故事主角朱力安最後的喪母之痛爲他帶來真正的體認。讓他能夠在母親的死亡中，看見錯誤的認知、拒絕認錯與拒絕寬容所可能引發的悲劇。朱力安母親的死無法喚回，但是對認知上的侷限與錯誤的坦白承認，以及對人的錯誤的寬容體恤將會是朱力安母親的死亡所帶來的慘痛但深刻的教訓。而母親死後所必須面臨的自我反省與可能因之而產生的，澈悟之後的寬容體諒，也許將可以讓朱力安這位接受南方新教育的年輕人修正他偏狹的文化意識與空間印象。因爲社會空間原本即是多重空間的

矛盾、交錯與越界，雖然這共同與多重的空間有著歷史時空遺留下來的問題，有著因政治、經濟、法治與舊有思維而來的社會限制，人們亦各自有其獨特的身份、地方認同與歸屬，然而歐康諾在這些異質空間的交錯中，不僅突顯了錯誤可能引起的悲劇，也同時展現出可能的諒解，使五〇年代充滿種族抗爭的南方城市空間顯現出微弱的凡興／生者必聚／合的可能。

引用書目

- Agnew, John. "Place and Politics in Post-War Italy: A Cultural Geography of Local Identity in the Provinces of Lucca and Pistoia." *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Ed. Kay Anderson and Fay Gale.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1992. 52-71.
- Althusser, Louis.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93.
- Baumgaertner, Jill P. *Flannery O'Connor: A Proper Scaring*. Wheaton: Harold Shaw, 1988.
- Bromley, Ray. "Working in the Streets of Cali, Colombia: Survival Strategy, Necessity, or Unavoidable Evil?" *Unruly Cities*. Ed. Steve Pile, Christopher Brook, and Gerry Mooney. London: Routledge, 1999. 96-9.
- Browning, Preston M. Jr. "Psychology in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Reading on Flannery O'Connor*. Ed. Jennifer A. Hurley. San Diego: Greenhaven, 2001. 101-08.
- Desmond, John F. *Risen Sons: Flannery O'Connor's Vision of History*.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87.
- Edmondson, Henry T., III. *Return to Good and Evil: Flannery O'Connor's Response to Nihilism*. Lanham: Lexington, 2005.
- Fishel, Leslie H. Jr., and Benjamin Quarles, eds. *The Black Americ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0.
- Fitzgerald, Robert, ed.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Mary Flannery O'Connor. New York: Noonday, 1989.
- Frazier, E. Franklin.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 Giannone, Richard. *Flannery O'Connor and the Mystery of Love*. New York: Fordham UP, 1999.
- . *Flannery O'Connor, Hermit Novelist*. Urbana: U of Illinois P, 2000.
- Gregory, Derek. *Ideology,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London: Hutchinson, 1978.
- Hendin, Josephine. *The World of Flannery O'Connor*.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70.
- King, Richard H. *A Southern Renaissance: The Cultural Awakening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30-1955*. New York: Oxford UP, 1980.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3.
- Leventhal, Willy S. ed. *The Children Coming On...: A Retrospective of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Montgomery: Black Belt, 1998.
- Lynch, Kevin.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IT P, 1992.
- O'Connor, Flannery.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Flannery O'Connor: The Complete Stor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 . *Mystery and Manners*. Ed. 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2.
- Olsson, Gunnar. "Lines of Power."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Ed. Trevor J. Barnes and James S. Duncan. London: Routledge, 1992. 86-96.
- Parmar, P. "Black Feminism: the Politics of Articulatio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101-26.
- Pile, Steve. *The Body and the City: Psychoanalysis, Space and Subjectiv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 Pollock, Griselda. "Modernity and the Spaces of Femininity." *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Ed. Jane Rendell,

- Barbara Penner, and Iain Borde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54-67.
- Rendell, Jane. "Displaying Sexuality: Gendered Identities and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treet." *Images of the Street: Planning, Identity and Control in Public Space*. Ed. Nicholas R. Fyfe. London: Routledge, 1998. 75-91.
- Rendell, Jane, Barbara Penner, and Iain Borden, eds. *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 Robinson, Jo Ann Gibson.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and the Women Who Started It: the Memoir of Jo Ann Gibson Robinson*. Ed. David J. Garrow. Knoxville: U of Tennessee P, 1987.
- Rutherford, J.,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 Rose, Gillian.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xford: Polity, 1993.
- Shields, Rob.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9.
- Sibley, David. "Outsiders in Society and Space." *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Ed. Kay Anderson and Fay Gale.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1992. 107-22.
- Smith, Felipe. *American Body Politics*.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98.
- Soja, Edward W. "The Spatiality of Social Life: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Rethorisation."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Ed. Derek Gregory and John Urry. Hampshire: Macmillan, 1985. 90-127.
- Strigley, Susan. *Flannery O'Connor's Sacramental Art*. Notre Dame: U of Notre Dame P, 2004.
- Stirling, James. "The House Slave and the Field Slave." *The Black American:*

-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 Leslie H. Fishel, Jr. and Benjamin Quarles.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0. 107.
- Westling, Louise. *Sacred Groves and Ravaged Gardens: The Fiction of Eudora Welty, Carson McCullers, and Flannery O'Connor*.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85.
- Whitt, Margaret Earley. *Understanding Flannery O'Connor*.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5.